

文学现场

挑战、融合与重生

——“人工智能时代中文学科高质量发展峰会”发言纪要^①(节选)

彭玉平 蒋述卓 王立军 张旭东 张福贵 朱国华 等

摘要: 2025 年 7 月 15 日至 18 日,“人工智能时代中文学科高质量发展峰会”在厦门大学召开,国内多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围绕 AI 技术对中文学科的多维影响展开深度对话。与会者从学科建设、文学创作、文学研究、语言研究、教学实践等角度出发,探讨了人工智能与人文精神对抗、协同、交融、共生的复杂关系。学者们指出, AI 在数据处理、文献检索、模式化写作等方面展现显著优势,但在原创性、情感表达、历史语境理解等方面仍存在局限。会议呼吁中文学科应在坚守“人文优先”原则的基础上,主动探索人机协同的新范式,推动跨学科融合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构建兼具传统底蕴与数字素养的中文学科新生态。本次峰会系统梳理了 AI 时代中文学科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为未来学科发展提供了理论反思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 人工智能;中文学科;人机协同;人文精神;学科转型

人工智能时代的诗歌困境

彭玉平(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AI 给大家和这个世界带来了挑战,有的人为此高兴,有的人为此担心,高兴的原因是很多基础的、简单的、常规的事可以交给它,省去了人的很多烦累;担忧的原因是人的地位好像被部分剥夺了,既然很多工作可以用人工智能去完成,则历史上的天、地、人“三才”似乎要加上人工智能而成为“四才”了。这带来了许多新的哲学问题,比如人类是否依然很伟大,是否依然

不可替代,是否依然值得敬畏……这些问题显示出 AI 带给我们的观念和职业上的动荡。

我今天讲的是诗词创作领域。我曾经有幸与中华诗词学会的会长周文彰一起开会,他在发言中说,现在我们每天的诗歌创作数量近 5

^① 参会者主要有彭玉平、蒋述卓、王立军、张旭东、余江、王尧、李继凯、杜晓勤、张福贵、董晓、朱国华、黄发有、冯国栋、王本朝、赵稀方、贺仲明、于亭、李锡龙、王冬梅、罗鹭、刘旭光、沙先一、李跃力、谷鹏飞、赵涛、时世平、蔡梦麒、陈涛、李广益、周云龙等,会议纪要由徐勇、刘月悦、杨云超等整理。

万首。这是什么概念?《全唐诗》总数近49000首,现在的诗歌创作数量差不多一天就能达到一个唐朝所创作的诗歌数量,这还不包括AI创作的诗歌。这一方面是令人恐怖的创作数量,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令人担忧的创作质量。在我认识的朋友里面,确实有每一天的生活从诗歌创作开始的,他每天早上4点多钟开始写诗,准时发在几个群中,风雨无阻,有时一天可以写两首,不存在一天一首不写的。

老先生的每一天从诗歌开始,我虽然不能理解他为何每天都有创作冲动,但还是觉得这总比每天攒蛋、打麻将好。很多的诗词活动,他也到场。曾经有记者采访我,你怎么看待某某先生的这个诗歌,我说我感觉他的诗歌创作水平一直很稳定;然后记者再问稳定是什么意思,我就回答,他的诗歌符合格律,平平仄仄一点没问题,韵脚也没问题,但就是审美与言外之意少了一点。

我一直觉得写诗的人跟诗人是两个概念,就好像写毛笔字的人与书法家是两个概念一样。清代的江湜曾写道:“我要寻诗定是痴,诗来寻我却难辞。今朝又被诗寻着,满眼溪山独去时。”^①真正写诗的人,不可能每天写诗的,他只有受到特别的感动,才会写诗,所以像这位每天起来苦苦找诗的人,其实已经违背了写诗的一个真谛,因为诗歌是必须敬畏的,而敬畏就给诗歌创作带来了很多的条件。我们让AI写诗,就是给它下指令,然后它来写,受制于此前的大数据,AI写诗只能在大数据中翻跟斗;如果AI以后不受任何指令就能写诗,其对诗人的挑战才算真正开始。

那么对高水平的诗人,AI的冲击怎么样呢?我觉得AI在抓文辞、意象、基本体式以及普泛性感情等方面,有一定的优越性。但是AI创作诗歌的高段位空间十分有限。换句话说,AI写的诗可能比前面提到的那位老先生写的要好,但它不能冲击“一流”的诗人,因为原创才是诗歌的生命。

AI写诗建立在大数据的基础上,大数据里面有《全唐诗》《全宋词》等,你让它写个东西,它就能智能调动这些知识储备来写,所以AI写的诗在我看来只是诗歌的次生品,它建立在前

人诗歌的基础之上,不是原创品。一等的诗人不是努力就可以的,还需要天赋的加持。就如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李清照的“易安体”,她用的每一个字你都认识,但这些字经过她重新组合却产生了新的震撼人心的意思,这个就叫天赋。

AI永远写不出的诗歌又有哪些呢?比如“红杏枝头春意闹”^②,因为写这样的词句,你必须在现场,必须对现场特别有感觉,才能写出来;AI也永远写不出“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③,因为这是非常特殊的个人化情感和场景;等等。这样的诗句才是诗歌不可替代、至为尊贵、永为经典的个性生命和灵魂。如果不这样写,那就是纯粹的文字组合,里面没有一种现场感,没有个人的一种灵感。没有个人的想象形成的诗歌,那还叫不叫诗歌?

如果论触及灵魂的诗心诗境,一般写诗的人与AI都是无计可施的,因为没有灵魂的诗歌其实不能称为诗,只是一种符合诗歌文体句式和规范的文句组合,所以有的人写了一辈子诗,他依然是个写诗的人,而成不了“诗人”;有的人其实写得不多,但他是个诗人。“乌台诗案”以后,苏轼被贬到黄州,这一特殊的经历促使他创作出了特殊的作品。作为文坛巨擘,他虽然被贬到黄州,但来求见的人依然很多,然而他不能见,因为“乌台诗案”的教训就是不要轻易给人写文字,不要轻易见人,万一你下次倒霉,这些人就会都跟着倒霉。所以他“称病不见为良计”^④“市人行尽野人行”^⑤,路上没人的时候才出门,在夜深人静时独行,刻意疏离这个喧嚣的世界。正是在这种孤独自省的状态下,其诗性才得以焕发。我们读他的《海棠》:“东风渺渺泛崇光,香雾空濛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⑥这样的诗歌没有天才永远写不出

① [清]江湜著,左鹏军校点:《伏敬堂诗录》,第27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②③ [清]朱祖谋编选,施适辑评:《宋词三百首》,第22、2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④ 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四),第1867页,北京:中华书局,2021。

⑤⑥ 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一),第405、407页,北京:中华书局,2021。

来,为什么?因为这种感觉很孤独很寂寞。夜阑人静,唯海棠相伴,诗人唯恐花也“睡去”,更添孤寂,故而要点燃蜡烛,留住这深夜的慰藉,这便是诗人的情怀。凡人的情怀没有这么细腻和深沉的。

因此,诗人自信的根源,就在于诗人之心一定有想象与灵感的加持,没有灵感跟想象加持,诗歌就没有魂。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本是很普通的一句,谁都能写,但是“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却是没有诗人之心就写不出的句子。^①换言之,诗人并不是每一句都超出你的预想之外,而是在你熟悉的句子里面突然来这么一句点醒你的诗心。李清照说:“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②前面“只恐”一句是常人能写出的,也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但“载不动、许多愁”六个字,就只有诗人才能想得到,并真切地书写出来。

从事创作一定是要灵感的,没有灵感,写出来的文字就没有光泽。我们推崇的文学作品一定是质感、光泽都有的,这就离不开灵感的加持。陆机的《文赋》对此说得很清楚。灵感的特点就是来去无踪,不可控制,所以不可能每天在规定时间内写诗,因为那肯定不是灵感驱动,而是勤奋与苦思。一流的诗歌要有深入的生活体验,要有宏阔的诗歌格局和指引向上一路的诗歌价值观。

那么, AI 什么时候能够超越人类?如果只写人类尝试过无数次的文体,那么它永远超越不了人类已经写出的诗歌经典;但是 AI 哪一天自己创造了一种未来文体,人类没写过,那么人类可能就写不过 AI 了。这种未来的文体什么时候出现,它是一个怎样的形式,其实我也不知道。或许,如果“人工智能”前面“人工”两个字可以去掉,“智能”的真正威力才会发挥出来。

所以,有使命感的诗人,请相信自己。

技术时代文学教育何为

蒋述卓(暨南大学党委原书记、文学院二级教授,汕头大学特聘教授)

教育技术的发展,从粉笔黑板时代到 PPT 时代,再到智能技术时代,是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

然而,无论教育技术手段如何变化,教育的核心命题始终未变:传道、解惑、育人。“仁”是教育的核心。从教师角度看,是“达己达人”;从学生角度看,是“成人”。同时,教学中的基本矛盾也未曾改变——教与学的对立统一,其最佳解决之道是实现“教学相长”的和谐局面。

如今,技术与人却构成了新的一对矛盾。技术与教师、技术与学生之间的关系,都对教师形成了挑战。我们需牢记:技术是工具,这一新矛盾的本质是人与工具的矛盾。人必须是主体,工具不能反客为主。坚持人的主体性,是解决人与技术矛盾的关键,即实现“人机共存、人机共生”。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追求“教学与技术相长”——既要坚持教学相长,也要实现技术与教学的良性互动。

我们不能完全依赖技术。例如,有教师仅依赖 PPT 授课,却完全不与学生沟通,这样的技术应用意义何在?技术应服务于人,教师的主体性必须体现为与学生的交流互动。否则,人便丧失主体地位,技术反而成为统治人的工具。当然,精心制作 PPT 等准备工作确有益处。例如,利用 AI 技术动态展示杜甫在四川的游历路线,能增强教学效果,但教师仍需注重与学生的沟通。

对教师而言,掌握新技术的培训变得至关重要,学校正将其作为重点培训内容。在技术普及时代,学习机会得到极大丰富。例如,学校的后勤人员(食堂员工、保安等)通过新学习平台持续学习,其知识水平甚至可能超越博士、教授。同样,新技术平台使普通人(如快递员、保洁员)也能成为优秀诗人,如王计兵的诗作因其真切的生命体验而感人至深,技术快速地将普通人带入了文学创作的时代。

《南方周末》的“创意写作学堂”便是一个例证。它通过技术上的运作,在全球招募学员,每期数千人,每人收费数百元,邀请名家(如余华、格非)授课并批改作业,甚至吸引欧美作家参与学习并设立奖项。这种模式类似但超越

① 徐汉明编校:《稼轩集》,第 166 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0。

② [宋]李清照:《李清照诗词集》,第 26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人工智能融入中文学科 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王立军(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我们中文学科到底应该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它,是非常狂热地拥抱它,还是应该冷静地审视它,这确实是值得思考的。

眼下,“人工智能时代”已经成为热词,各个学科都在讨论,我们中文学科实际上在这半年以来,也已经在不同的场合讨论过这样的话题,前不久,北京外国语大学还专门召开了一个人工智能对中文学科发展影响的专题讨论会。在那个会上,像张福贵老师等各位老师也都发表了高见。就像刚才张老师、蒋老师和彭老师所说的,人工智能对于我们中文学科来说,它的一个核心身份就是工具,这个有点像我们原来说的“语文”的双重性质,即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结合,这现在转而用来说人工智能和中文学科的关系也是合适的。

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工具?当然我们要根据它的实际效应,认真审视它对我们的学科有没有切实的帮助。上次在北京外国语大学那个会上我也说了,中文学科并不是铁板一块,其对人工智能不会采取一致的态度,这既不可能,也不现实。中文学科内部又分很多二级学科,就其中的语言和文学这两大阵营来说,其对待人工智能的态度就不一样。

文学学科可能更多地从文学创作、文学评论去考虑人工智能的问题。对于语言学科来说,人工智能的工具性可能要远远大于文学学科。一方面,人工智能所依赖的大语言模型就是基于语言学研究之上而建立的;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又为语言的研究带来更大的助力。因此,我们讨论人工智能对中文学科的影响,要区分中文学科各个二级学科、各个研究方向,要去思考这些不同的二级学科到底应该如何跟人工智能相结合,如何让人工智能能够切实发

过去的电视大学,凭借资本和技术力量取得了显著效果,对高校中文系创意写作人才培养形成了挑战,其示范效应值得我们关注。

这促使我们回归教学的核心问题:不仅要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To Learn),还要培养其实践能力。同时,教师自身也必须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当前教师群体正面临巨大的终身学习压力。教学的核心还在于培养学生的思考、批判与辨识能力(To Think)——即深度思考、判断是非的能力。在技术时代,学生不能仅是信息接收的终端,而应成为知识的思考者、批判者与创造者。即使借助 AI 获取信息,也须具备分辨能力,不可照搬,否则易出错。例如,我曾测试 AI 对文学“形神”及“文道”关系的理解,它将“山水以形媚道”^①错误归源于唐代郭熙,其实则为南朝宗炳所倡。若缺乏知识储备和辨别力,直接引用便会犯错。学生和教师皆应如此,避免事事依赖技术。过度依赖技术可能导致思维惰性甚至退化,如同收银员过度依赖机器,一旦断电便无法心算找零。因此,中国基础教育中基础能力(如心算)的培养仍需坚持,教育需“守正创新”,例如珠算技艺可能成为非遗,但核心能力不可废弛。

教师、学生与技术之间还催生了另一新矛盾:抄袭与创造。如何检验学生作业是否抄袭(尤其借助 AI)成为道德难题。技术挑战需通过技术来应对,“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技术的发展将催生“用人工智能反人工智能”的检测工具,设置障碍以培养学生的辨识、批判与创造能力。学生使用 AI 技术会在电脑上留下痕迹,尽管实际操作中难以查验,但如同论文查重技术,在资本驱动下,此类反抄袭技术必将出现。当然,技术解决方案本身也可能伴随新的问题出现(如流氓软件),因此我们需要审慎对待技术。

在技术时代,我们的态度应是:学习并善用新技术,实现“教学与技术相长”。教育必须坚持“守正创新”,着力培养学生和教师自身的终身学习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最终,教师需在“达己达人”的过程中,完成对学生“成人”的培育。如同雕塑家在雕琢作品的同时也在打磨自身,教师也应在运用技术的实践中不断完善自我。这才是我们教学的中心任务。

① [晋]陆机等撰,刘斯奋译注:《晋唐五代画论译注》,第18页,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

挥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不能像贴标签一样,把人工智能硬贴上去。其实在北师大中文学科,我也多次跟老师们说,希望老师们能够关注人工智能,不管哪个学科,先关注它,然后看人工智能到底适不适合,如果适合的话,不妨用它来助力我们的研究,提高我们的研究效率。特别是在语言学科中,我特别强调要把人工智能这个技术引进来。

也正因如此,我们从今年开始,从本科阶段就推出了“汉语言文学+人工智能”的双学士学位培养项目。跟往常的双学位概念不一样,这个项目的学生经过4年的专业学习,就可以直接拿到计算机科学和中文学科的汉语言文学两个专业的学位,这也是一个新的尝试。其实就语言学来讲,我们北师大一直紧跟技术发展。我的导师王宁先生在进行传统语言学研究时就高度重视技术应用,很早就将信息技术与汉字研究、传统语言学研究相结合。例如,我们开发的“汉字全息资源应用系统”,便是将数字化技术应用于汉字研究的成果;王宁先生主持开发的“数字化《说文解字》研究平台”,更是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入《说文解字》研究。这些均为早些时候的成功探索。在此数字化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将人工智能技术引入古代语言研究。

以“汉字全息资源应用系统”为例,该平台集成了从古文字到现代楷书的历代汉字信息资源,汇聚了字形、字音、字义、字用、编码五大类属性信息,提供多元化服务功能,特别是强大的“系联”功能,如构形系联、训释系联、语音系联。借助平台集成的历代字书训释系联功能,研究者可将解释同一字或相关字材料汇聚关联,便于观察其内在联系与演变脉络,从而助力于上古汉语词汇系统、语音系统等研究。相较传统依赖人工抄录卡片进行有限比对的低效方式,数字化平台能集成更大规模、更复杂的材料系联网络,极大拓展了研究视野与深度。这充分证明技术可为研究提供强大助力。传统的研究方式,主要是靠抄卡片,就像我们的老师指导我们的,《说文解字》系联就是靠抄卡片,那种人工所抄的卡片,系联范围是很有限的。我们把这些信息集中在一个数字化平台里,就可以让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得以把更多的资

料更大规模地系联在一起,从而呈现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

在 ChatGPT 出现之前,我们已基于国家语委重大项目“古籍整理智能化关键技术研究”,开发了“AI 太炎”平台(命名旨在向章太炎先生致敬)。该平台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古籍整理的智能化,最终功能包括:古籍自动标点、自动注释、自动翻译以及典故自动提取。典故识别是古籍阅读与注释的难点,但平台通过海量精加工数据训练,能有效掌握并自动抓取典故。同时,凭借其处理大规模数据的能力,“AI 太炎”还能辅助发现并修正现有大型辞书在释义、书证(文献引例)、标点及翻译等方面的错误。实测表明,该平台在特定古籍处理任务上的表现远超普通博士生水平。如果博士生不借助文献去跟“AI 太炎”比拼,是拼不过“AI 太炎”的。

“AI 太炎”能达到这样效果的关键,在于其采用了与当前其他通用大语言模型(LLM)不同的技术模型——垂直领域专业模型。通用大模型(如 ChatGPT)常因数据庞杂而产生“幻觉”,如张冠李戴(错误署名)、虚构参考文献、随意关联信息等。为规避此类问题,“AI 太炎”并未基于通用模型,而是利用海量经专家精校标点的古籍语料库进行训练。这就使得该模型专注于专业领域内的思考,其信息关联与推理严格限定在可靠的专业范围内,从而大幅减少产生幻觉的可能性。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人工智能的智能化,就完全躺倒了靠它工作,这是不行的,包括上面提到的那个系联工具,它只是我们提供的工具,要解决什么问题,还是得靠专家借助工具去实现。所以人工智能仍然是一个工具,但是怎么用好这个工具,是值得我们中文学科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AI 与传统文学教育的范式革命

张旭东(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东亚系教授,国际批评理论中心主任)

目前,在美国人文学界, AI 已渗透进教学研究的各个环节。一些理论出身的德语系、媒体研究系同事已转向这方面的专门研究,应用新

知识新技术,创立了“数字人文实验室”等跨学科研究平台,整合计算机科学、脑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应用数学开展深入的方法论和应用研究。我本人相对“保守”,只利用现成的国际批评理论中心冬季研讨会,组织了一场由纽约大学、波恩大学、东京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四校师生参与的“技术时代的人文学”讨论会,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的确是AI。我觉得高度专门化的整合研究,目前仍是少数前沿学者在做。对于大多数学者,包括我自己,对AI的接触和了解还停留在同自身研究和教学直接相关的直观和实用层面。

其中一个具体的挑战,是学生作业中AI使用的泛滥。海外中国留学生对AI的依赖似乎更明显,也更缺乏必要的反思,所以其作业和论文有时让老师很头疼——它们往往带有明显的“背书”甚至“抄袭”的痕迹,这也许是“应试教育”和以教材、教师为中心的“标准答案”教育的后果。但是AI时代其实并非有利于这种“知识传授—知识归还”的教育模式和惯性思维,而是恰恰暴露和放大了那种“会查找、会复述信息”的低端重复式教育的弊端。越来越多的同事正在探索新方法应对这个局面。其中一种简便方法,是在期末布置学生用AI撰写一篇“论文”,但同时现场手写一篇个人化的分析和评论,以考核学生在获取AI提供的知识的过程中,是否具备起码的解释能力、判断力、分析能力和批判性思维。我觉得这在目前还不是一个简便有效的办法。

这个权宜之计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点出了问题的要害:在AI时代,无论是知识的传授,还是知识的生产,都再一次面临什么是意义理解、意义阐释和意义创造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人工智能时代人文学科发展的基本问题,也是中文学科提质发展的关键。其中所包含的信息—知识—观念和观念生产问题,带来了阅读与理解的实践及其理论的全面更新。相对于系统性知识传授,相对于学术传承、权威等老问题,知识摄取同人的判断力、理解力之间的张力,以及这种张力能否带来可持续的观念讨论和知识创造,似乎是更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人文学科的边缘化在中国和美国都能感受到,但我觉得这

个一般情况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其实用不着多谈,更用不着焦虑。我想多说几句的是,AI为文学研究或者整个人文研究带来新的可能性,就此有以下几点和各位同行交流。

首先,AI极大拓宽了研究视野和信息来源。它能处理海量文献,进行大规模语言分析,为研究提供新视角和更大的视野,能催生有关文本和艺术形式探讨的新议题,因此毫无疑问将成为跨学科、跨语言研究的强大工具。这个知识生产工具上的飞跃,或许尤其有助于打破中文教育和知识界存在的单一语言框架的限制。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研究本来就是世界文学和世界学术的一部分,我们“学科”基础的现代起源深深植根于世界文学和世界学术的土壤。以鲁迅为例,他的翻译与创作在语言模型层面实难区分。今年,我在对鲁迅文学的详尽文本分析中越来越意识到,翻译是鲁迅在创作中遇到困境时的“充电站”,是他精神上的大地和语言上的灵感源泉。鲁迅的创作语言和翻译语言事实上共享着同一套语码、同一套句法、同一套语汇,而鲁迅的写作,就其“文学革命”和“新文化”的本质而言,事实上更接近自德国浪漫派以来的主流翻译观,那就是翻译的真正目的不是把外来语变成母语,而是把异域植入本土,从而推动本民族语言内部的开放、创新和变革。AI在跨文化知识获取、打破语言封闭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养成比较视野和批判问题意识方面,潜力无疑是巨大的。

其次,AI在理解和阐释层面再一次提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前理解”与“后理解”的问题。“前理解”是阐释学中强调的、作为理解基础的“前见”甚至“偏见”。现代阐释学认为,“偏见”和“阅读的效果史”一样,是理解活动的前提。它的局限性可从积极的意义上去看。没有基于文化、经验、价值观形成的认知框架,面对AI提供的大量知识碎片和语义联想,我们容易陷入断章取义或无效拼凑。“后理解”则指的是在AI提供相对完整的“知识”之后,如何进行判断、分析、批判性阐释和观念生产。这正是人文学的核心能力所在,也是当前最需要强化的环节。

我认为,如果AI能为人文学科带来一场范式革命,其契机就在于此。因为它极大地挑战了

传统人文学科教学和研究中的固有模式,即那种一直为人诟病但却又难以真正摆脱的应试教育模式、教材模式、教师一言堂或“传授系统知识”模式,包括死记硬背、经验主义、历史主义的师徒相授,封闭的“学术规范”的束缚等,结果就是学科发展的保守和迟缓,就是“天下文章一大抄”的低端重复的知识生产。面对这种现状, AI 有望将学者和学生从低端重复性的知识复制工作中解放出来,而这种工作可能占据了学生从本科到研究生教育的相当大精力,包括怎么查资料,怎么厘定研究边界,怎么确定研究范围和标准,怎么学做文章、发文章,怎么在更大的学术共同体和学术思想“场域”中交流、切磋和提高。AI 的介入,可以让我们将更多的精力和智慧聚焦于“后理解”环节——即知识的创造性生产。我们需要大力推动从知识传授向知识一观念创制的转变,强调想象力、创造力(希腊语“Poiesis”的本意,即“创制”——在自然之上创造新事物,无论是技艺还是思想);同时聚焦于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深入探讨。有了时代性、创造性和国际性的“后理解”,中国人文学方才有条件去深入探索历史性、社会学、人类学意义上的“前理解”,即决定我们集体潜意识结构的符号、心理和价值构造。这就好比我们能从“故纸堆”里读出什么东西来,越来越取决于我们今天在人文研究核心问题、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领域的讨论达到怎样的水准。这种高水准的讨论固然需要建立在牢固的语文学(文献学)训练的基础上,但 AI 对这种基本的知识准备并不是障碍,反倒是一种学习工具和手段上的助力。

再次, AI 作为大规模语言模型,有助于中文学术突破单一语言和单一学术话语场的限制,在一个真正国际化的时空里学习、研究、交流。相对于西方学术界,中文学界仍然是相对孤立闭塞的,在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尤其如此。AI 渗透进学习、教育、研究和学术批评的各个环节,一方面固然会带来种种问题和挑战,比如懒惰的遇事就问 AI,但同时也可能会带来摆脱封闭僵化的训练体系和知识结构的自主学习革命,带来一种以问题为导向、以批判性阅读为核心的新学术标准。AI 带来的许多积极“副作用”之一,是能够帮助我们借鉴科学领域

全球实时知识生产与共享模式。在自然科学领域,不管中国、德国、日本、美国哪个实验室有什么微小的进步,理论上讲全世界所有的博士生、博士后都会同时看到。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充分国际化的研究平台、研究团队、知识共享和学术评价模式,或许能助力中国的人文学界建立起更前沿、更专业、更科学严谨的研究态度与共享机制,帮助我们克服某些体制性或习俗性的系统偏差。总之,中文世界的人文生产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AI 可以为这种呼之欲出的范式革命助力。

最后,我想我们也必须正视 AI 在中文语境下的特殊性。例如工具理性同构与人文学科边缘化制度化,这虽然是全球性问题,但在特定社会和文化环境下也有不同的表现,包括教育体系的惯性,即应试教育、高考制度、教学写作的同质化与僵化问题。语料质量也会成为一种无形的瓶颈,即统计学上所谓“垃圾进,垃圾出(Garbage In, Garbage Out)”^①问题。中文大模型训练语料的质量(如风格趋同、修辞贫乏、信息环境受限)直接影响生成内容的质量和创新性。这些特殊性提醒我们,在鼓励批判性思维、知识边缘突破、建立开放学术共同体的努力中,需要更具策略性和韧性。

人工智能与中文学科的共生： 机遇与路径

余江(天津商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人工智能和中文学科共生,这是一个必然趋势。即便是作为似乎远离或者比较远离技术的传统中文学科和汉语教学研究者,过去 5 年,包括在座诸位的可能都几乎亲历了 AI 从概念到教学科研工具的转变。作为时代和历史的见证者,我深刻地体会到了 AI 不是冰冷的工具,而应是照亮传统经典的明灯,它带来的不应该是危机,而是文明传承的崭新可能。下面我主要基于对目前国内高校——其中有些就是在座诸位所在学校——已做或者正在做的一些工作的

^① 胡昭民编著:《信息技术随身词典》,第 42 页,青岛:青岛出版社,1998。

了解,以及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一些思考,跟诸位做一个简单的交流。

第一个方面, AI 带来了研究方法层面的革新。可以说,当下 AI 技术的发展使文学经典“火”起来了。过去学者穷尽一生只能研读有限的经典,而如今的 AI 技术却让我们可以实现对经典的全景化扫描,瞬间就可以对其进行全景洞察。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注意,技术只是一个新的“脚手架”,思想才是目的。我们绝不能因为算法的强大而放弃对经典文本的细读。再有, AI 也成为我们进行文学研究的“时空穿梭机”。可以说, AI 技术打破了传统研究的时空局限。目前,国内高校正在进行或已完成的通过 AI 展开文学研究的技术尝试,如对《红楼梦》中 4000 多个人物的关系图谱进行瞬间生成,进而就此展开可视化研究和分析,就是非常成功的典型案例。还有一种尝试,就是通过技术手段,让李杜的诗歌和 19 世纪西方的诗歌进行跨时空的意象对话。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利用 AI 技术建立类似于经典文献数字化的协作工作组,开发意向分析工具包等,以推动资源的共建共享,进而为文学欣赏、诗歌解析提供新方法与新视野。

第二个方面,在教学模式的转型方面, AI 进一步推动了教学从知识搬运向思维锻造的转变。AI 在课堂教学方面引发了革命性的实践。越来越多的老师开始使用 AI 作为智能备课的助手,减轻了很多低层次的工作强度;也有老师通过 AI 进行沉浸式的写作训练;还有老师通过 AI 复原濒危方言的声音系统,推动了方言保护和方言教学……此外,在 AI 技术的辅助下,师生的角色也被重新定义。教师从知识的传授者变成了学习的设计者,而学生从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批判性活动的协作者。AI 在教学方面带来的最关键变革,是使我们一直推崇的因材施教真正成为可能——当系统为每位学生生成个性化的学习路径的时候,我们就得以真正践行孔子的教育思想: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第三个方面,在文化传承方面, AI 能够让传统更有效地接轨现在和未来,这也使得经典实现了破圈性的突破。我们可以利用 AI 技术,将经典中的意象与现当代流行歌曲中的意象进

行比对,从而发现某些意象所具有的跨时空的共性。这种穿越古今突破领域的对话模式,可以更有效地提高年轻人对经典的接受度。此外, AI 技术的引入还可以使母语教育真正实现有效的守正创新。本人一直在做汉语推广方面的工作,由此发现一个现象:现在的小学不再教笔顺了,这就导致现在的孩子在书写过程中出现大量的倒插笔情况。如果能在中小学推行 AI 笔顺矫正系统,实时反馈书写错误,我们就可以让学生从小真正理解汉字,学会正确书写汉字。再有,我们还可以通过 AI 对经典阅读进行游戏化设计,通过角色扮演进行差异式阅读,提高学生对经典文本的理解程度。但是我们也要注意,技术赋能绝对不等同于简单的娱乐化。我们要时刻警惕技术炫技对文化深度的消解,就像我在做这个发言 PPT 的时候,曾试图借助 AI 工具,结果就是炫酷的技术呈现掩盖了发言内容,所以我放弃了对 AI 工具的借助。

第四个方面,我们要如何应对关于 AI 的伦理风险。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在技术浪潮中,我们要始终筑牢人文的堤坝。目前,在 AI 技术的使用与推广中存在着一些常见的风险,比如说刚才诸位谈到的 AI 幻觉、AI 分析的不准确等。站在中文学科的立场上,我们应该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如“三校验”原则,即要做到历史语境的还原、经典注疏的比对、现实价值的校准。我观察到,已有高校在开展上述工作。还有一个问题是 AI 带来的文化偏见。目前,使用较多的翻译软件在对某些特殊词汇和概念进行翻译时,经常会出现误译误读。这一问题要怎么处理?我想我们需要建立相关的文化敏感词库,对一些特殊的语汇、词语概念进行特别标注处理。另外就是学界比较关注的学术写作的规范问题,包括学术伦理失范、AI 代写论文等。目前已有高校推出论文溯源系统,强制规定标注 AI 的参与度,从而有效遏制论文写作的投机行为。

面对上述问题时,我们应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要立足人文精神,承认技术的合理性。面对 AI 技术的浪潮与趋势,我们既不能置身在技术之外,也并不反对人文精神的技术表达。比如可以大胆地在中文专业里边开设诸如“AI + 文学伦理”等课程,这一举措能有效提高学生,尤

其是中文学科学生的技术判断能力。此外,仅仅从锻炼写作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可以鼓励师生大胆使用 AI 工具进行一些实验性的写作。因为写作不是天生的,虽说天赋之于写作十分重要,但是要写出上佳的好作品,还是需要通过一些训练,才有可能实现。通过 AI 的训练,我们就可以摹写出兼具文体技术规范和特定风格、又含有现代关怀的作品。当然,这里涉及技术应用的核心原则,即技术应用必须遵循人文优先的原则,我们绝不能一味追求技术效果而背离文化本真。

最后,聊一下如何构建人机共生的中文教育新生态,我认为可以由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在学科建设方面,我们或许可以设立智能人文教研团队,培养复合型人才,这方面北师大“汉语言文学+人工智能”双学位项目就做得比较好。我们还可以推广建设“经典数字孪生系统”,对更多的文学经典进行三维建模,实现可检索、可关联、可推演的立体化研究。

在教学改革方面,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行双师课堂,搭建教师主讲、AI 助教的教学模式;还可以构建能力本位的评测体系,减少记忆性的考核,增加“AI 辅助研究项目”和“数字人文作品”等创新性的评价指标。

在学术研究方面,我们可以进一步建立人机协同的研究范式,以 AI 为“研究助理”,由其负责数据清洗、文献整理等基础工作,学者则专注理论建构和思想创新。

此外,我们还可以与技术企业进行联合,发起“中华经典智能传播计划”等项目,让更多的典籍转化为多语言的数字化产品,推动其在更广阔的元宇宙平台进行跨文化的传播。

各位同仁,两千年前,张骞凿空西域,用双脚丈量文明交流之路;今天我们正手握 AI 这把新钥匙,开启文明传承的新境界。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自我认知,即在面对技术冲击时,要勇于做技术浪潮的摆渡人。技术的浪潮不会褪去,人文学者的使命始终是让技术成为传递智慧的舟楫,而非遮蔽星空的乌云。让我们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拥抱 AI,因为在这场人机共生的文明实验中,中文学科永远拥有最珍贵的遗产,也即我们天然的优势:那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①的永恒的赤子之心。

人工智能时代中文学科的建设问题

王尧(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这是我原来准备的题目,刚刚听了几位的发言,我也调整一下发言内容,就人工智能时代中文学科的建设问题说一下我自己的想法。我也没有做 PPT,这样更显示出人工而不是智能的特点。前段时间中国人民大学和苏州大学在苏州举办了中国人文学科年度发展大会,我也做了一个主题发言。我谈论的话题是人文学科最大的危机是什么,我认为是阐释世界的思想能力在弱化。后来澎湃新闻对此做了报道,使之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发言的视频发布后,有读者留言,问我思想能力弱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今天我们在讨论人工智能与中文学科发展的关系时,不能完全理想化地想象 AI 技术会一帆风顺往前走,然后被这个想象牵着鼻子来设计我们的学科。中文学科发展,其实是学科体制、技术、资本、学者个人选择等多方综合协商的结果,其过程是非常复杂的。

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最完整的中文课程体系是《清华大学人文学科年谱》中的相关记载,它详细记载了民国时期清华大学包括文史哲在内的人文学科课程体系设置及其教师学术著述情况:课程如何设置、怎么调整,这一年哪些教授发了什么样的文章、出了什么样的著作等。另外一份材料是北京大学成立一百周年时内部发行的校史,记载没有清华大学的详细。

参照《清华大学人文学科年谱》可以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清华大学的人文学科体制有所变化,但是在课程体系上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动,仅在某些方面参照苏联模式进行了部分调整,以及在政策取向上发生了部分变化。20 世纪 90 年代末我去香港和台湾访问的时候,发现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使用的是当年清华和北大的课程体系。1996 年以后,中文学科融入了互联网相关技术,学科整体发展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当时就有部分学者非常关

① [汉]司马迁:《报任安书》,钟基、李先银、王身钢译注:《古文观止》(上),第 364 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

心中文学科是否会消失等问题,但是到现在为止其仍然没有消失。互联网的兴起、网络文学的出现改变了我们对于通俗文学乃至文学的定义与理解,这是百年中文学科发展不变下的新变。

西南联大时期的总务长郑天挺、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的罗常培三位先生曾一起商讨如何办中文系。清华大学中文学是由文人入史,北京大学是由史入文。当下关于文学、文学史的争议就源于当年北大和清华“由文人入史/由史入文”之辩。这是一直以来存在于学科内部的争议。因此,我觉得我们不能只关注学科外部的危机,学科内部的危机也需要关注,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讨论人工智能时代中文学科发展,要注意区分创作和研究。创作和研究与AI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二者分歧比较大。这方面我赞成玉平兄的观点,就是特别优秀的经典与创新之作,AI是无法产生的。另外一个问题,几千年以来,我们虽然积累了许许多多的文学遗产,有许多伟大作品,但是包括我本人在内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平庸”写作。创新是写作者追求的目标,但很不容易。我最近新著的长篇小说《桃花坞》,讲述的是抗战沦陷后国内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书生意气、儿女情长。其中的男女主角方后乐和黄青梅从苏州到西南联大读书,师从朱自清与闻一多先生。抗战胜利,方后乐到北平跟随清华的朱自清先生读研究生,后来到哈尔滨解放区投身革命。黄青梅喜欢林徽因,后来到美国费城读书去了,可能回来,也可能不回来。两人的命运在结尾时是不确定的。这部小说在《人民文学》发表后,一个中学生在江苏书展上找到我,问我这两个人后来有没有在一起。中国人追求大团圆,他说他问了豆包和DeepSeek,结果都没有答案。我说没有答案的原因,第一,王老师不是伟大作家;第二,《桃花坞》刚刚发布,还没有进入数据库,没有进行数据处理。这就说明写作和研究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就是对于作家而言,一定要做到修辞立其诚。AI写作因为处理了其他文本,所以就可能存在抄袭的嫌疑。这是现代技术的危险。

当人工智能改变了我们生活,生活伦理、生活方式肯定会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人文学科

的研究内容和方式肯定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对此,我们应当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略谈中文学科建设 ——以创意写作与华文文学等学科为例

李继凯(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人文科学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

我对“学科建设”情有独钟,或者说,这是我这辈子积极参与其中的一项事业。我当年在学校研究生处干了8年多,实际上主要操心的就是理工等学科建设。在这之前的1995年,我曾在中文系当副主任,主要分管学科、科研以及研究生。2001年春我进研究生处的时候,学校只有几个博士点,后来我离开的时候,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就有了100多个博士点。学校地处西部,学科建设面临许多困难,但在艰难发展中还是逐渐扩大了规模。在此基础上,为了更好地促进学科发展,学校成立了学科建设与211工程发展规划处,有人称其是学校的小“发改委”。今天在座的各位大都是各校中文学科的掌门人,都是领军人物,都在学科建设方面投入过许多时间和精力,也很熟悉全国中文学科建设的情况。大家都知道,陕西师范大学的中文学科是学校重点关注和支持的学科,在中文学科发展进入一个关键阶段且面临严峻考验的时候,学校成立了一个人文社科高研院,我被推选为首任院长。在陕西师大,我参与推动了不少“化无为有”的事,但也有不少悲欣交集的体验。所以一谈到学科建设,我心情就特别复杂和沉重。总之,学科建设极不容易,但是,它又是极为重要且必须与时俱进的一项工作,这次厦门大学召开“人工智能时代中文学科发展峰会”也是个现实例证。

实际上,我觉得我们中很多人,包括不少已经退休的人,仍然还会感觉到学科建设的某种沉重,我想各位领导和掌门人肯定也会经常有类似的感受。我曾经把这样的感受或体会,以及在工作当中积累的一点经验写出来,编成一本书《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这本小书实际上表达的也是我那种深切且复杂的人生体验,包含着一个诗意化的微笑和一声叹息,也有一根烟的袅袅和一口酒的惬意……

本来,我为会议提交了一份发言稿,有好几页。我最近发了两篇小文章,一篇题为《中文创意写作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发表在《写作》上;一篇题为《关于文明互鉴、华文叙事和华文学科的若干思考》,发表在《华文文学》上,主要强调的是华文文学这一学科应该受到相应的重视,并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要办好相关学术期刊等,进而争取进入教育部批准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的正式榜单,就像“中文创意写作”及“民间文学”等学科那样。

我仔细听了前面各位领导老师的发言,这对我的启发非常大。我已经有点垂垂老矣了,为何还要这么关注 AI 时代的信息?我在研究陕西文学批评史的时候,曾提出“全息史料”的概念,就是要有与信息时代、AI 时代相匹配的概念,我们需要用这样的观念去思考相关问题。从我们陕西师大走出去的叶舒宪先生曾提出四重证据法,就是要捕捉各种信息,包括来自远古神话和田野考察的信息。人与 AI 相磨合,实际上是共生共存、共同发展的。我们现在处在跟 AI 磨合的一个紧张时期。一方面很多人赞美 AI,要利用和发展它;另一方面,不少人认为 AI 确实可能带来危机,认为它给中文这种基础学科带来的冲击实际上是相当大的。我属于乐观派,认定 AI 与“爱”同在,它可以与大中文学科紧密结合,而这种彼此互动的共生模式,实际上也体现了一种相互成长的“人机”关系:人类在发展, AI 也在互动中成长,而且是迅速地成长;人机磨合、人机协同,生活会更加美好。

我本人经常用 AI 去查这查那,包括生活上的问题和写各种文章需要参考的信息。我也曾尝试用 DeepSeek 写此次会议的发言稿,它很快就写了七八千字,提供了很多思路。我本来想在这里好好念一下 DeepSeek 写的东西,因为它几乎已经把我们现在议论的那些观点囊括其中。关于热点问题,已经公开发表的文章、会议报道有很多, DeepSeek 整合了之后,就能给你提供几千字的文章,而且能把基本观点概括起来。刚才,我还让它写一首赞美 AI 时代并同时揭示其危机的诗,它很快写成了一首新诗。我经常使用 DeepSeek 写小诗或对联,它在“平仄”格式上没有大问题,但在真实情感表达及语言细节方

面会有问题,对语境和对象把握不准,这就需要认真修改完善。比如,我曾参加浙江大学参与主办的良渚论坛,会后征文,我让 DeepSeek 按照我的意思写了一篇散文,然后再对其进行修改,把我跟一些海外华文作家的具体交往和对话穿插其中,最后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我觉得 AI 时代的来临绝对符合人们努力的整体方向,因为它就是人的发明,是人类的一项重大发明。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把 AI 当成一种工具,我们可以发现它十分先进,而且发展空间很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 AI 带来的各种危害和危机,特别是它制造的文化垃圾。多年前我在北师大访学的时候,听过王富仁老师一次演讲,那个时候他就特别强调文化过剩这个概念。他说,文化垃圾的堆积让人喘不过气,甚至让人灰心丧气。你很努力,但你的话已不被关注或仅仅被瞬间关注,这真的是不好的感觉。甚至有时候我也觉得,人工智能的不当发展或过度泛滥,真的有可能给人类带来重大灾难。这就是我说的“AI 原子弹”概念,我们需要像防范原子弹一样来防范 AI。人与自然需要维护生态,人与 AI 亦然。我们中国的传统智慧一直警惕着技术层面上的东西,中国在传统上有技为末的理念。人与 AI 的关系特别复杂,但最终还是应当走向和谐,通过磨合建构起适配关系。

时间关系不能细说,但我还想简单说一下,广义的世界创意写作功能非常巨大,中文创意写作亦然。我们实际上有一种深深的情结,就是要把汉语言文字弘扬传播到全世界去。创意写作,包括学术性的写作,还有文学性的,以及各种应用文的写作,是一个非常大的写作学概念,而且要有走向世界、影响人类的追求,这就与华文文学、华文书写的价值追求一体化了。

我对华文文学这一学科的介入虽不多,但我意识到,大部分华文作家都是一批勇敢走向世界的华人,他们把华文的写作、华文的书写带向了全世界的各个地方,使得我们华人文化、中华文化能够真正走向世界。但是华文文学学科在我们国内还是相当边缘化、羸弱、建设不到位的。例如,各个高校的中文系或文学院基本没有设置华文文学教研室,把华文文学这个学科看得比较偏。实际上,华文文学学科应该是一个中

外结合研究世界华文文学的学科,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的高度国际化的人文学科。前面说过,相关的情况我已经写成了专门文章,有兴趣的老师可以在知网上看一下,多多指教,谢谢!

关于中文学科有组织科研活动中 团队与平台建设路径的经验与思考

杜晓勤(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今天的议题除了人工智能 AI,其实还有关于学科建设、平台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个人认为,有组织的科研以及团队的建设,对我们中文学科的发展依然很重要。下面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这几年从事的中文学科有组织科研、学科平台建设的一些经验。

首先是跨学科平台的搭建。2017年,我在系里主要分管科研工作。当时中文系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教研室、中文系内部的二级单位有13个,且各个专业之间存在着厚重的专业壁垒和各自为战的情况。语言专业和文学专业的交流很少,语言专业和文献专业的交流也很少,甚至于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交流也不太多。

针对上述情况,就要打破所谓的人为设置的学科壁垒,解决不同专业人员之间缺乏沟通的问题。因此,我们建立了三个学科平台。

中国古典学平台。王立军老师见证了我们这个平台的建立过程。这一平台将当时我们的“三古势力”(古代文学、古代汉语、古典文献)合在一起,现在已拓展为“五古势力”,新加入了古文论、古文字。平台建立以后,我们又从课程设置、教学、科研等方面设立了平台的机制,还建立起了一系列的学术工作坊。

现代思想与文学平台。该平台把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比较文学、民间文学、文艺理论等合成一体,平台上的老师不再各自为战,可以合在一块干活,包括教学与科研。

语言与人类复杂系统平台。该平台是对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语言学实验室、应用语言学等专业的集成。

这就出现了许多原来属于单一教研室的老

师,现在同时跨几个平台的情况。比如说古文论方向的老师,他既属于现代思想与文学平台,也可以跨到中国古典学平台;古代汉语专业的老师,他既是中国古典学平台的重要一员,又是语言与人类复杂系统平台的一员。

其次,在搭建学科平台的基础上,我们以研究问题、学术兴趣点为主题,成立了一系列的工作坊,并以工作坊的名义,分配一定的科研经费。每个老师可以参加两个工作坊,但是每个工作坊至少要有三名成员,且至少横跨三个不同教研室。第一年我们就成立了21个工作坊。工作坊成员需定期讨论交流,可以采用讲座、座谈、集体考察等形式,增进成员间的学术交流。这样在无形之中,我们就以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为纽带,根据其兴趣的相近与性情的相投,把原来比较松散、习惯单打独斗的老师们组合在一起了。系里还鼓励大家每个月集中在一起进行学术科研活动,想要申请第二年持续支持的老师,需要提交活动报告,并不一定要求发文章,只要达到了有效沟通交流,即可通过。这就是工作坊的运行机制。

最后,在工作坊运行三至五年后,我们自然就促成了课题组研究的机制。现在,我们有三到五个重大课题,其就是基于工作坊一课题组的交叉,即以学术问题为中心,实现大学科的交叉融合。以我参与的一个工作坊为例,我本人研究诗歌格律,同时也涉及声律、乐律,因此就吸纳了研究语音音律、古琴音乐学、文学以及语言学音系的学者,形成了七八个人规模的工作坊。在工作坊举办活动的时候,虽然有些讨论看似海阔天空,但彼此之间的交流其实特别有启发。

此外,近四年,我们引进、选留了二十二位新老师,其中有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也有兄弟单位支持我们的。这些新鲜血液进来以后,我们往往会把他们与各专业的老师聚集在一起,欢迎他们入职、入会(加入读书会、工作坊),其乐融融。这样,我们这些新教师马上就融入这个大家庭,彼此之间不仅能互相交流,还能获得不同的平台支持,举办、参与不同的学术会议。同时,系里还会邀请他们担任系里重要期刊、学刊的执行主编、特约编辑和学术会议的召集人,他们

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锻炼和成长,获得了学界曝光度与学术影响力。经过这些锻炼与培养,他们接下来自然而然就会成为我们中文学科的学术中坚,所以这几年北京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的发展还是不错的。

因此,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科平台建设和科研团队组织工作,我自认为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效的。当然,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全国同行的大力支持。在此,我要向国内外的同行再次表示感谢。

人工智能的方法论价值 与人文学科的本体论危机

张福贵(教育部中文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刚才宗益校长提到厦门的天气很热,可能比天气更热的是当下的人工智能热潮。今天我们在此举办高端论坛,讨论 AI 与中文学科乃至中文教育的发展,意义非凡。我想谈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 AI 赋能文学。这点不容忽视或无视。AI 对文学教育和研究的最大意义在于其不可替代的方法论价值。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公共理性的量化表达。人文学术历来见仁见智,长期缺乏定量分析,导致研究相对多元化和个性化。这虽体现个性特征,但也易产生碎片化倾向。人工智能在方法论层面,无论是资料整理、知识扩展还是逻辑算法,都为中文学科教育发展,尤其是研究,提供了公共理性的工具价值。例如,判断文学经典如何产生,过去主要依靠阐释。借助 AI,我们可以进行更大范围、基于扩展数据的定量分析,强化对经典构成的认识。这种公共理性的量化表达,极大地促进了文学研究的数字化、逻辑化和公共性。

第二个方面,拓展认知对象与边界。借助 AI 这一工具,包括教材编写在内,都发生巨大变化,它急速扩大了我们的认知和理解范围。我在承担“马工程”文学史教材编写时提出需注意“三化”:基础知识标准化、核心知识个性化、背景知识多元化。在基础知识和背景知识层面, AI 的介入确实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三个方面,语言表达形式革新。AI 介入文学创作和研究,极大地改变了人类语言表达

的多样性、活力和应用效果。尤其在应用文写作领域, AI 几乎颠覆了原有认知。若论语文危机,此处体现最为明显。

其次,文学或社会科学如何赋能 AI,即新文科教研。当我们谈新文科时,常想从文科角度拥抱技术,向前发展。但我们也应思考:理工科技术是否也应拥抱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这种“新”是否也需“向后”?向后发展,寻找向前发展的动力,或许更是文科的课题。要做好新文科,首先要做好旧文科,特别是中文学科。

那么,文学如何为 AI 赋能?刚才宗益校长强调要“放大我们特有的锚点”,这极为重要。我们是否应从反向讨论: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如何为人工智能提供新的伦理原则和价值尺度?健康、正常的文学创作与研究的独特价值是稀缺而珍贵的,这正是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对通用人工智能最重要的校准和辅助。鲁迅先生当年在日本撰写文言论文时,面对科学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盛行的时代,在西学东渐浪潮中提出“掇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①,即是对当时两种潮流的反驳。我们是否也需对人工智能作出某种反驳?

因此,我非常赞同宗益校长提出的人文精神介入——人文精神以及个性化的思想情感不可替代。例如,即使 AI 写作盛行,也无法替代作家基于个人真实生命痛感的创作。对于文学研究,更重要的是以人类性、人性为价值尺度看待研究对象,并审视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一旦设计完成,易形成“算法意识形态”。当这种意识形态成为价值尺度和逻辑规则时,会弥漫于社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在此情况下,文学研究如何运用人文精神和人类伦理来抵消人工智能的简单工具理性?

最后,我一直认为,中小学教育不宜过早引入人工智能,应缓行,因为人工智能大模型中的“认知幻觉”问题日益严重,其表现不仅是胡编乱造,甚至对历史典籍无中生有。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传授知识,后者启迪思想。中小学生对 AI 过早使用,可能将 AI 产生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第 46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的认知幻觉和虚假文本当作知识接受。正如当年历史剧、清宫戏的流行,它们本身也成为一种历史文本,影响民众对历史的认知。因此, AI 进入教育领域必须慎重。

文学教育应坚持以人为本,它是纪实性、互动性的,是眼对眼、心对心的交流。人工智能的工具价值定位不可动摇,更不能被放大。在人工智能发展史上存在“加速派”和“对齐派”。我深知,在市场化追求、国家博弈和个人急功近利的推动下,加速派终将战胜对齐派。在此背景下,人文学术,特别是中文学科,如何纠正或努力调整人工智能在教育、研究、学术乃至人性和文明发展过程中带来的偏颇,这一任务任重道远,对此我深感忧虑。

中文拔尖人才培养之我见

董晓(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人才培养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过程。2019年我们开始了拔尖计划,新生经过一次考试,选拔出十几个人进入该计划。那么,如何去培养他们呢?我们采取了在课外给他们开小灶,提高保研率的方式。但尝试了一年之后,我们果断放弃了。我们认为这样的二次选拔,其本身的合理性是有问题的,因为在南京大学的文科中,中文的录取分数线已是连续四年最高了。汉语言文学专业一年只招六十儿人,各个省只有一个或两个学生,甚至没有,这些学生的高考分数差别也不是太大。从这些学生中再选拔十几个人开小灶,这是不公平的。现在的学生竞争非常激烈。我们的保研率只有35%,不到40%,保研资格的获得主要看学分绩点。因此,学生听课的功利性非常强,做课程作业、考试也是如此。学分绩点要计算到小数点后四位,因为排名对学生非常重要。这样一来,竞争就更激烈了,学生读书也体会不到什么趣味。这不是我们理想中的人才培养模式。我们在二次选拔中选出的所谓精英,是不是精英,都要打个问号。他们高考分数高一点,再开小灶,让他们的绩点高高在上,保研率接近80%甚至100%,这是非常不好的。

2022年我们开始调整培养计划。首次入选

的15个人开始采取滚动制,也即其不再是固定的,不再保证下一年还在拔尖班中。我们把这一制度叫进出机制。这15人还是和其他同学一起听课,只不过他们还要多参加一些学术活动,比如引领其他同学组成各种读书会,举办主题读书会时组织大家进行讨论。我们根据读书会的情况对他们进行评定,适当加分,一年以后进行考核,考核项目包括读书报告、学术活动组织情况等。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让这15个学生能够积极地组织大家读书、读原典。我们一直强调中文系的学生可以少读一点教材,多读一点作品、理论的原典,还有研究著作的原典,这才是正道。但在现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学生读书的功利性很强,读书会正是为了部分减轻消极功利性而设置的。这一措施实施一年以后,这15个学生反弹非常厉害。因为取消了拔尖班保研的优势特权,他们非常愤怒。我们给他们解释了这样做的原因。从2023年开始,我们下一届的学生适应了这种方式。所以,我们对拔尖人才的培养模式做出了调整。读书会的表现作为拔尖班考核的一个重要依据,目的在于减轻学生的这种功利性内卷程度,增加他们读原典的动力,这应该是中文人才培养的一个基本规律。我们的一切人才培养措施都是为了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背景下,让中文专业的学生能够在大学期间读更多的原典。

AI与文学研究

朱国华(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庄子曾经提出一个理想:“物物而不物于物。”^①这就是说我们要让外物为我们服务,但又不被外物牵着鼻子走,这其实很难做到。今天像ChatGPT或者DeepSeek这样的聊天机器人,尽管没有真正的推理能力,只能基于概率和已有知识生成答案,不能创新或自主思考,但是在许多方面已经具备了大大高于普通学者的高级智能。只要某种规则体系比较明确,它们就能比大部分人运用得贴切、精准。

^① 方勇译注:《庄子》,第318页,北京:中华书局,2010。

举例来说,如果文本细读的程序是可以归纳的,如果理论的范式是清晰的,如果给定的文本是明确的,机器操作就非常简单。胡应麟在比较李杜时有个说法:“李杜二家,其才本无优劣,但工部体裁明密,有法可寻;青莲兴会标举,非学可至。又唐人特长近体,青莲缺焉,故诗流习杜者众也。”^①掌握法则最好的诗人是杜工部,他也被誉为诗圣,因为追随他的人最多。AI 其实都是可能的伪诗圣,能把诗歌的平仄用典等规则运用到极致,除了缺了点灵魂。把这种情况类推到文学研究上来,今天所面临的困境是,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是李太白那样的天才。面对 AI 的挑战,彭玉平教授列举了很多伟大的诗句,告诉我们不要慌张。AI 的诗歌是没有灵魂的,没有人味的。但是我认为诗已经到了要捍卫自身的地步,本身就说明了危机的紧迫性。彭玉平教授进行的区分是天才和常人的区隔,计算机只能达到常人的水准,他觉得即便 AI 的运用普遍化了,也不必担心天才在未来没有用武之地。这里值得关注的是, AI 的一个重要效应就是锐化了天才和常人的区隔。我的核心论点是 AI 会威胁未来天才的生成,至少是我们现在理解的那种天才。有一个人类学家叫阿尔弗雷德·克鲁伯(Alfred Kroeber),他说天才总是成群而来,他强调了天才得以形成的社会条件。比如说社会包容度,比如说像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这样的怪人能涌现出来,是因为英国社会容忍他,他才能成为天才。但是,我想说技术有可能使我们现在所默认的那种天才不再出现,因为 AI 会改变我们的阅读方式、学习方式、研究方式。我们现在其实没法上课了,因为上课是对已知知识点的传播, AI 比所有老师要知道得多。我们的论文也没法写了,因为天才总是极少数人,大多数人没有办法超越现行的普遍认可的规则。还有就是天才和天才之间的互相砥砺切磋很重要,他们也需要一些捧场的人。维特根斯坦这些人必须有一些追随者跟在后面摇旗呐喊,让他的思想发扬光大,要不然他也成不了维特根斯坦。简单来说,天才往往需要依赖一个有机的学术圈,无论圈子大小。但是未来 AI 成为强势存在了,未来维特根斯坦们的平庸追随者可能就难以存活了,因为学术圈赖以存

在的可能性几乎消失了。AI 不是训练,不是像练书法,要先描红,在描红的训练过程中,有错误可以纠错,然后不断重复。AI 不是这样的,它是一步到位的,它的原理本身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学习过程,它直接把答案给你。即便 DeepSeek 会展示它貌似推论过程和学习过程,但其实我们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时间内往往会跳过这些过程,直接了解结论。

大家都知道图灵(Alan Turing)测试的道理,简单说,它的核心是判断机器的对话能否让人感觉跟真人无差。只要表现上过关,我们就不必深究它背后的技术原理。打个比方,就像我们开车,不需要懂得发动机的构造,只要能熟练驾驶就够了。同样, AI 的关键在于它的表现是否令人信服,而不是它如何实现。它给我们的东西,我们直接使用就行了,不需要进一步沉思或想象。这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以前那种沉浸式阅读经典好像变得没有必要了。对我们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来说,有深度和广度的经典研读是必要的。这种研读涉及的是一种内在的理解,但现在好像不需要这样的内在理解。AI 为我们有目的地抓取知识提供了便捷手段,知识的获得可以通过输入关键词,或者发出指令实现。我们无需阅读,无需理解语境关系,就可以直接调取所需要的材料,并在这个基础上做研究。当然,这个过程不是因为今天有了 AI 才出现的。有了知网之后,我们把关键词输进去,知网就会给我们提供一大堆文章。当然,专业的学者不这样做,但是很可能未来很多学者会这样做,他们会根据 AI 提供的最新方式,也就是去历史化的方式来被动接受相关研究领域的材料。如果未来是这样,那么可以说,我们的研究方式就不再是有机的,看到的材料就不再是特定语境和历史视域下的具体材料,而是抽象的,也很容易是肤浅的,达不到对社会事实的更深切认识。抽象社会是我们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我们的社会其实已经越来越抽象了。我们小时候,有街坊邻居,是熟人社会,跟他们有互动,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这种邻居了。我们以前

① [明]胡应麟:《诗薮》,第 190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有各种各样的小店,现在小店都是各种连锁店的分支,没有特色了。我说的特色是指老板的诡异笑容,或者反映店主个人喜好的装饰风格等。我们跟快递小哥的关系是抽象的,我们不需要了解他是谁。AI会暗地里把当下社会已经具备的现代性特点以一种更强、更有效的方式强加给广大用户。这个抽象的、现代性的特点就是阿多诺(Theodor Adorno)称之为同一性暴力的东西。最近我注意到社会学家项飙,他说我们正在失去附近,意即我们不需要通过中介、通过周边来理解社会,我们跟社会的联系其实是抽象的联系。当然,我在这里可能明显夸大了AI的能耐。它被设计成无所不能、可以应答世间所有问题的样子,但是事实上它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所以它一定会存在幻觉。当然,幻觉问题始终是人工智能专家们想解决的问题,将来AI的幻觉很可能会越来越少。

我觉得我们文学研究的历史可能会被划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前AI时代,另一个是AI时代。那么相关的文学研究人员也可划分为两种:一种是平凡的大多数,容易屈从于AI的逻辑;另外一种是可以驱使AI为自己服务,像李白这样的、极少数的学术精英。大语言模型破坏了文学研究的有机生态,当然,广义上来说整个人文学科可能都面临这样的遭遇。AI成为人类所有现存知识的集成者和代理人,切断了普通学者、优秀学者、高端学者、卓越学者和天才学者的金字塔式共同体链条的连续性,并以自己的效率不停地将获取的新知识转换成无差别的数据,由此捣毁了天才赖以成长的文化生态和学术根基。比如说唐诗,如果李白、杜甫是一流的,那么王维、孟浩然可能是二流的,此外还有刘长卿、韦应物这样的三流诗人,曹邴、罗隐这样的四流诗人等,这是良性的差序格局和金字塔结构。当然,我承认这种区分过于主观随意,不大严肃,主要是比照文学史留给他们的篇幅大小来划分的。整个唐诗界都是有机的,诗人们互相学习,每一个诗人都积极寻找对自己有利的创作空间。但我们现在这样的环境可能就不再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有机的生态了,学者之间交流借鉴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了,我们越来越单独地面向网络空间,这些空间里有无数的声音跟我们对话,它们看上去是人类

发出的,但实际上是机器发出的。那么问题来了:我们文学研究的队伍还需要这么多人吗?可能会萎缩。如果说整个队伍萎缩的话,那么天才的追随者就没有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天才可能也就没有了,所以我很担心。

当然,我们往好的一面想,AI技术可以激活许多文学研究的新方向,如数字人文之类的,我不否认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但是,我觉得未来的学术研究如果不关怀人类经验的内在性,只是进行实证主义的思考和论证的话,它存在的理由就非常可疑,它就变成了自然科学的一个附庸了,这是我非常忧虑的地方。也有可能未来人类更加推崇在知识搜索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思想杂烩,更加喜欢文学研究带来的快感舒适,而不是智慧的痛苦,他们可能把文学融化在电影、短剧、游戏等未来更加刺激感官的文化实践当中,将之作为甜点加以享受。举一个例子,我们系的同事汤拥华教授最近发表了一个毕业典礼致辞,收获了几百万可能上千万的粉丝,为什么?因为他谈的是短剧。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大学生们热爱短剧。我们研究的传统文学,比如《红楼梦》《人间喜剧》等,对年轻的孩子来说已经不再重要了,所以我们面临着一个可怕的人文学科的未来景象。隋朝有一个人叫杨素,他很喜欢跟一个有点结巴但很聪颖的士子聊天,因为他的回答都是出其不意的,他的机锋容易产生智力的娱乐效果。杨素问他,假如让他去做将军,守一个城,这个小城只有不到1000守军,粮草只能供两个星期,外面是数万人围攻,他该怎么办。他沉吟良久,说:“审审如公言,不免须败。”^①我说这个故事的意思是,我们有时候可能真的不一定有很好的办法。我暂时想不到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只能在这里表达我的忧虑了。

AI时代的中文学科挑战

黄发有(山东大学文学学院院长,山东省作协主席,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首先,从文学的角度来讲,受AI影响最大

① 陈文新编著:《六朝小说》,第421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的应该是网络文学。相比于网络文学创作, AI 对其翻译的影响更大。近年来,“网文出海”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典型范例。一些专门做网络文学作品外文翻译的公司,比如“推文科技”,在翻译网络文学时,广泛使用 AI 技术。AI 的翻译效率大大高于人工翻译,人工翻译者一天的工作量, AI 只需一分钟就能完成。另外,网络文学在面向北美和东南亚市场时,还有一个遴选机制,面向东南亚翻译传播的大多是女频文,比如“种田文”“大女主文”这类霸总文作品;面向北美市场译介的多是玄幻小说,甚至还有“狼人小说”这类作品。在阅读网络文学作品时,我们也会发现其中存在非常明显的 AI 痕迹,尤其是很多作品中的场景描写,基本上都是由 AI 代笔完成的。

其次, AI 查重对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有着直接的影响。比如说国家社科基金结项、学位论文答辩都需要过查重关。很多学校要求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查重率不能超过 10%,这就促使很多博士生通过答辩之后,提交论文时都要挖空心思地降重,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术研究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尤其是中文学科。作为基础研究,文学史料方面的研究难度非常大。史料研究如果不引证大量的材料,很难将问题阐释清楚。研究者如果对史料都不熟悉,要有进一步发现,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要求学位论文的查重率在 10% 以下,那就意味着论文中不能引用太多的史料。因此有些学生为了降重,往往把引文拆分得支离破碎。所以 AI 查重技术对我们这个学科的学术研究冲击非常大。

最后,我想讲的是, AI 赋能对中文学科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当前,教育部重点推动交叉学科的研究,很多高校已经设立了学科交叉中心。山东大学作为新文科的牵头单位,由我们文学院牵头,成立了一个数智人文分中心,其职能主要是培养博士生。它的整个培养机制与普通的中文专业博士生培养机制有很大区别。与此同时,研究生院下面还新设了学科交叉中心,专门招收交叉学科方向的博士生,这些学生的学籍也都由学科交叉中心统一管理。它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重交叉还是弱交叉。对人文学科来讲,大概只能做到弱交叉,因为重交叉存在很

多问题,比如文学院跟软件工程学院合作做重交叉,我们负责招生,但是最后学生申请的是软件工程的学位,到毕业时,学位论文的学科归属就会成为一个很难讲清楚的问题。正因如此,我们文学院选择的方向,主要是经典数字化、数字人文与网络文学研究、数字技术语言认知科学研究、生态文明与生态美学等。在这些方面我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即便如此,我们也只能是先探探路,至于后面如何发展,其实也很难预知。这个问题可能不仅是山东大学的问题,也是整个中文学科普遍面临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教育部在重点推动这方面的工作,各个大学的学科交叉中心最后都要向教育部汇报工作进展和育人成效,撰写各种材料。

我认为 AI 对于中文学科发展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在保留中文学科自身的传统优势和学科属性的基础上,从交叉发展中找到崭新的空间。当然,这也很可能也是中文学科发展、转型的一个重要机遇。

数字时代中文学科的机遇与隐忧

冯国栋(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我主要讲四个方面:一是“一个现象”,二是数字人文的发展对古典文献学产生的重要影响,三是作为方法的文献学的失落,四是创新性、情感性的发现变成一种机械性的劳作。

第一,一个现象:在中文学科里,数字人文或者人工智能的运用在各二级学科之间是不平衡的。研究语言学和文献学的学者普遍对于人工智能或者数字人文更有兴趣。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许多研究数字人文的老学者原来的学科背景是古典文献学或者语言学。另外,我们会发现,现在数据库做得比较大的,也多是古籍出版机构,比如说中华书局的“古联”,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尚古会典”。古籍出版社在推动数字人文发展,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正是这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

第二,数字人文会对古典文献学产生哪些影响。古典文献学的分支有目录、版本、校勘,也包括古籍的点校,这些学科及其研究范式受

数字技术的影响非常大。比如说以前做目录,要一本一本地去查,查好了再用手工的方法编制一个目录。现在,基于计算机、互联网的联合目录已经基本上把我们编制简单目录的工作取代了。再比如说版本研究的问题,以前我们找版本,只能靠一些工具书检索到版本之后,再去图书馆查对。现在,我们通过一些专门的版本网络及其数据库,很容易就能获取很多版本,尽管不全,但是已经非常多了。有些不同图书馆所藏的版本,以前我们根本看不到,现在却可以对其做详细的对比。再就是古籍校刊和异体字、俗体字数字化处理,还有自动标点。这些目前虽然还存在着问题,但作为一个粗略的加工,还是可以节省大量人力的。可以说,这些都对古典文献学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

第三,数字人文来临之后,又对我们造成了哪些影响。我们常说古典文献学是提供材料的,但事实上我觉得它更多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训练。比如说,目录学其实是一种分类思维方式的训练。我们通过目录学的实践,建立了一种分类的观念,就是怎样把一堆东西分成不同的类别。分类观念在目录学的实践过程中变成也内化成了一种思维方式。再比如说版本,它训练的其实是一种田野调查的方法。语言学特别是方言要进行田野调查,其实做版本也要做田野,这个田野就是图书馆。去不同的图书馆找不同的版本,其实也是一种田野调查的方式,这种田野调查的方式也会内化成一种思维方式。再比如说校刊,它训练的其实是我们对于差异性的理解。这些工作,我觉得都是通过一种具身实践而得到认识,也就是一种全身心投入的认知。比如说翻古书的时候,我们有触觉。现在是一个视觉时代,我们的触觉退化了。其实我们在翻古书的时候,一定会有触觉的活跃,就是古人所说的“触手如新”。视觉时代,我们的触觉退化了,但触觉其实是一种非常深刻的记忆。现在,屏幕霸权的时代,记忆变成一种视觉主导的非常浮泛的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时代人工智能取代了我们许多工作,我们其实不仅失去了许多工作,也失去了一种方法的训练。这也就是我说的“作为方法的文献学失落了”。

第四,创新性、情感性的发现变成一种机械

性的劳作。我们研究人文的学者都有一种感觉,虽然我们在做一种技术活,但都是全身心投入的,而且偶尔的发现也会让我们很惊奇。如果这种发现变得很平常,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发现主要靠检索,同时,这种发现不再是一种主动的发现,而是一种被动的追随,那我们其实也就开始异化了。工作变成一个不停点击鼠标的重复过程,不再是一个切切实实的有创造性的过程。在这个时代,我们的学习多是从知识到知识,具身的认知是非常匮乏的。AI是从概念推导概念,从知识推导知识,但人的识知则是体验式的。比如我们对于桌子的认知,首先建立在对桌子的感觉的基础上,我们通过触摸、倚靠,才产生了对桌子的基本认知。另外就是检索和跳读成为获得知识的主要方法,结构性阅读匮乏。第三个当然就是表达的程式化,没有了创新性,情感性的表达也是匮乏的。

但是我觉得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可能是数字资产。我们学院一个做数字人文的老师有一次跟我讲,你有没有数字资产?我说好像没有。他说他有,因为他掌握了大量的数据。大量的数据在这个时代就是数字资产,而我们则是“数字赤贫”,这是一件非常要紧的事情,即数字资产和学术资本主义。当然这说得夸大了一点,但确实是一个现象。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有多少人,可以不用数据库去做研究。我想,基本没有了。如果真的没有了数据库,我们怎么办?其实,在数字时代,我们进一步无产阶级化了,变成一种赤贫的人和没有生产工具的人。劳动让物质变成了财产,但是,现在的状况是物质很多,财产很少。我们的学术和数字资产越来越少,这可能是我比较担心的。

处变不惊：人工智能时代 中文学科的生态与心态

王本朝(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人工智能时代已经来临。事实上,人工智能进入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时间并不遥远。回顾其近期发展历程:2011年实现了语音识别与听觉处理;2015年实现了图像识别与视觉处理;

2016年人工智能在决策博弈领域取得突破,如围棋;2022年开始应用于语义生产;2024年涉足视频生产,今年则聚焦于模型建构。从2011年起算至今,仅十几年时间,人工智能已历经多个关键发展阶段。

当前我们热议人工智能,思考决策,研究其应用。人工智能的核心特点在于能力强、成本低、应用广。其能力体现在注重推理服务、语言处理与文本生成;成本优势使其得以在办公、通信、金融等领域广泛应用。许多高校也正进行本地化部署,利用其辅助教学、科研及管理。人工智能具备智力分析、认知智能、感知智能和计算智能等特点。这些特性不仅对中文学习,也对其他学科学习大有裨益,尤其对中文学科建设影响深远,因语言文学学习是中文的基础。人工智能在语言处理、语言认知、知识积累方面,如文献查找、编目、收集整理以及文本感知分析,都能提供有力支持。例如,输入文章,它能快速概括主要观点,进行翻译、结构化写作甚至仿写,效率远超人类。这将对文学研究、史料处理、文学评论乃至专业评论产生影响,重塑相关研究生态。

然而,人工智能也存在局限。今日上午的讨论也指出,它可能带来研究学习的浅表化及版权、伦理等问题。特别是在价值判断层面,人工智能可以概括信息,却难以作出价值判断,其认知能力存在边界。例如,分析“小王告诉我:‘他不会说话。人都会说话。’小王是在说谎吗?”人工智能可能得出两种结论:若小王是婴儿或幼儿,缺乏语言能力,故非说谎;若小王是成人且无语言障碍,则可能在说谎或开玩笑。但这两种理解均不完整。句中的“不会说话”并非指生理上的不能说话,而是指“口才不好”或“表达不得体”。人工智能将其理解为生理缺陷或撒谎,未能把握其真实含义。

人工智能的局限还在于:它能基于海量数据实现某种“行万里路”和“翻万卷书”,但这往往是走马观花。它无法做到真正的“读万卷书”,其答案有时可能强词夺理、张冠李戴或胡言乱语。更重要的是,它无法替代人类学习(包括文学学习)中的“苦思冥想”。对于没有现成答案或材料的问题,它难以给出解答。比如,问“人为什么会做梦”,它可能回答是因为大脑活

动、情感处理、解决问题、大脑自我清理或无意义活动等,却忽略了梦境的个体差异及其无意识、神秘性的一面;再问“人死后会到哪里”,它可能从科学、宗教、哲学角度给出不同解释,但同样回避了问题的深刻性与个体性。人类的苦思冥想恰恰是其作为万物之灵的标志之一,体现了人独有的感悟力、想象力和创造力。

因此,人工智能技术虽能构建大型语言模型模拟人类智能行为,却未必能真正完全理解人类语言或代替人的意识。构建语言大模型不等于掌握了人类共同的心理语言,完成语言学习任务也不等于懂得了人的语言。关于人工智能能否真正理解人类语言,学术界本身也存在不同观点。

当前人工智能强调大数据、大模型、大算力。这类超大规模系统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人类个体的认知局限:实现从个体到群体的数量级跃变,从专用领域迈向通用领域(人类知识往往有专业性,而人工智能追求通用),某种程度上体现“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集体智慧效应。但它也解构了某些认知原则,如“眼见为实”——它在机器内部处理信息,将其视为事实,而这些信息却未必真实。

回归中文学科的学习与研究,我们显然需要人工智能的帮助,尤其在语言认知、史料处理等方面。然而,中文学科的核心在于文学的感悟、个性的独立与思想的创造。人工智能技术擅长的是复制、拼贴、查找、组装、链接,需要人类“喂料”。缺乏人类的创造,再多的组装拼贴也只是量的累积,难有质的飞跃。人工智能没有爱恨情仇,本质上是一个能快速检索、整合信息的工具。

在写作方面,人工智能擅长模式化写作(如写赋、旧体诗等),其速度甚至能“秒杀”许多普通作家。但其作品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提问或下达指令的质量,可谓“主强则强,主弱则弱”。它只能基于已有公开信息进行创作,无法触及未公开或未提供的内容。正如今日上午有老师所提到的,面对某些敏感的社会性话题,人工智能会选择回避,这与其他工具并无二致。因此,人工智能可以成为中文学习与研究中博学高效的助手,帮助我们快速完成资料的收集与整理。但若处处让人工智能代劳,坐享其成,

我们的学科及研究必将走向衰落。

综上所述,面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中文学科迎来了新的发展生态。我们应主动适应,甚至张开双臂拥抱它,但绝不能迷失自我,失去判断。我们需要以处变不惊的心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牢牢抓住中文学科的语言与文学两大基石,迈开阅读、思考、写作的坚定步伐,大胆前行。我们可以借鉴人工智能,但绝不能完全依赖它。在我们前方的,绝不仅仅是数据和信息,中文学科学习与研究的核心追求,依然是审美、文化、人类文明,以及等待着我们继续创造的更丰富的精神世界与心理世界。

跨学科的实践与意义

赵稀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二级研究员)

跨学科研究,我自己一直在实践,大体上,主要涉及外文系与中文系的跨学科合作。

首先谈翻译文学研究。翻译文学研究会设在外文系,不过中文系和外文系都有一批学者从事翻译研究。我在翻译研究会年会上主持翻译分会场,发现很多外文系读者的发言题目多涉及现代文学评论的翻译,如鲁迅的翻译、徐志摩的翻译、胡适的翻译等——这些都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与此同时,中文系也有一批学者在做翻译研究。既然研究相同的对象,我便尝试将两支队伍整合。后来我组织了一次会议,邀请的中文系和外文系学者占比各半,共同参与。两个学科的碰面是很有意思的,经历了一个由隔阂到理解再到合作的过程。

其次要谈华文文学与华裔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华文文学指中文系学者研究的海外华人用中文创作的文学,华裔文学则是外文系学者研究的海外华人用外语创作的文学。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研究领域,其中有许多著名作家。这两个学科的研究对象有共通之处,因为不少海外华人作家进行双语写作(华文和外语)。我认为这两种文学存在许多共同主题,因此与中国人民大学华语文学研究团队合作,共同创办了“华裔华文文学年会”,现已成功举办两届:第一届于2011年在西北师范大学举办,第二届于2023年在浙江传媒大学举办。这些实践让我深

感现有的学科分类(中文系/外文系)给我们的研究构成了很大的限制。每个学科都有其预设前提和结论,但这在另一学科的视角下往往难以成立,这种现象非常普遍。相比之下,社科院文学所的学者较少受学科限制,研究更依循个人兴趣和学术脉络发展。

以上是两类跨学科实践。但我今天重点想谈的是台港文学研究。严格来说,研究台港文学不算跨学科,因为台湾、香港的文学研究本应是中国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然而在现实中,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对台港文学往往不甚了解,两者实际上分属不同的学科。

以香港文学为例,其性质与中国现代文学存在差异。从现代性角度看,中国现代文学体现的是启蒙现代性,而香港文学则带有殖民现代性特质,这种根本性差异决定了它们在诸多方面都有所不同。我认为香港文学能为反思中国现代文学提供启示,如帮助我们重新审视启蒙现代性所带来的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内地倡导“全盘西化”,而香港则不同,英语是其官方语言,对于新文化的反映截然不同。五四时期的香港,一个重要主题是保存中国传统文学,因其对维系华人的中华文化认同起着关键作用,并特别警惕在英语主导的环境下对汉语认同的破坏。启蒙现代性与殖民现代性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从台港经验可以反思启蒙文化激进主义的影响。

另外的关键因素是冷战格局。二战后世界文学基本在冷战框架下发展,但中国文学有其特殊性。中国在冷战的中心,但在文化格局上却很少使用冷战视角。1950年代后的香港,是西方文化前沿的窗口。这导致了许多认知差异的产生。例如,从内地的视角来看,我们对张爱玲1950年代小说《秧歌》《赤地之恋》的评价越来越高,认为其深刻反思了土改,远早于内地1980年代以后出现的反思土改小说。但实际上,港台1950年代小说的主流是“反共文学”。我曾撰文分析这类文学的模式。在大量的模式化“反共文学”面前,张爱玲小说的创新性大打折扣。由于不了解这一背景,我们对个别作家的评价可能有失公允。

再如1970年代前后的新左翼思潮在香港

的兴起。当时香港爆发了一系列社会运动,如“保卫钓鱼岛运动”“中文合法化运动”,以及重新认识国家性质的运动。港台文学提供了重新审视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新视角。

我有一个观点:香港文学可视为 1949 年前中国文学真正的继承者。1949 年后两岸分离,大陆形成了左翼文学中心,台湾形成了右翼文学中心。香港则不同,它延续了 1949 年前多元共存的格局:左右政治对立,现代主义蓬勃发展,通俗文学阵营壮大。

虽然台港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本身不构成“跨学科”,但由于它们分别被归入“华文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且研究者彼此缺乏了解,所以在研究中实际上成了一个跨学科问题。

建立中国文学研究的大文学史观

贺仲明(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我谈的跨学科问题,核心是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关联意识。这是我在自身研究中产生的感触,并由此形成了一些想法。上午听了杜老师关于跨学科的发言,刚才又听了赵老师的发言,都对我很有启发。虽然杜老师谈的是语言、文学之间,以及语言、文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赵老师谈的是港台文学与大陆文学的跨学科关联,但我想强调的是文学史内部的跨学科,即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贯通,从而建立中国文学研究的大文学史观。

一方面,我在进行现当代文学研究时,深感许多问题若要深入探讨,就必然触及新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密切联系。例如,讨论诗歌文体的音乐性、散文与大众的关系及语言等问题,如果脱离其与中国传统文学的渊源,仅局限于现代文学范畴,确实难以谈深、谈透。只有将这些问题上溯到古典文学,在更宏阔的文学史背景下进行关联思考,才能理解得更深刻。这是我在研究中的一个深刻体会。

另一方面,我也关注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转化问题,并就此发表过文章。研究这个题目时,自然会关注既有的相关文论学者的研究成果。我感觉这些研究基本上都停留在纯理论层面,

没有考虑现实应用问题。而中国古代文论要真正实现现代转化,必须应用于现实——应用于现实的文论构建和当下的文学批评实践,这才是真正的转化。如果仅停留在纸面,空谈概念转换,却与现实的文学相脱节,就不能算是成功的转型。因此,中国古代文论真正的成功转化,必须与现实的文学创作、批评和理论紧密结合,也就是必须将研究视野延伸到现当代文学中来。

这两方面的思考使我认识到:现代文学研究必须具有与古典文学相打通的意识,学者们应该加强古典文学的素养,并培养学术视野上的贯通意识。这是深化现代文学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据我了解,很多研究现当代文学的海外汉学家都具备较强的古典文学功底,无论是在问题意识,还是在学术素养方面,都是如此。同样,古代文学研究也需要加强现实关注和关怀,学者们应努力将自己的学术研究与现实联系起来。我曾就此与一些古代文学学者交流过,部分学者表示有同感,并且认为:因为学术研究完全脱离现实,有时候会产生某种虚无感——也就是完全埋首在故纸堆中,与现实的文学生产、文学实践完全脱节,这会影响学术的意义感。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这种双向贯通的意识和努力,是非常有价值且必要的。

比如,这种文学史的贯通意识对学术研究的选题就很有价值。我观察到,一些博士生,甚至一些年轻学者的选题很容易趋向狭窄或偏门。例如在现代文学三十年这个相对有限的领域里,去深挖一些三、四流作家。文学史本应越写越精炼,此类研究的价值很有限。如果能够拓宽视野,加强学科贯通,找到一些重要问题来研究,显然会更具价值。另外,在学科设置上我也有点相关的思考。上午有老师谈到了近代文学的问题。个人的看法是,近代文学学科的设置,客观上在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制造了隔阂:现代文学研究最多回溯到近代,与古代依然相距遥远;古代文学研究向下延伸至近代,却很少关注现代。如果将近代文学或归入古代(如清代以降),或明确其通向现代的桥梁作用,就能迫使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两方面的学者直面彼此,增强关联的必然性。这或许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思路。

在实践层面,上午有老师提到的跨学科工

作坊或报告会形式非常有意义。我们也可以尝试更灵活的教研室合作模式,比如不以现代、古代、古代划分,而是围绕共同问题(如小说研究、诗歌研究)组建跨时段的研究小组。这种方式在现有体制下可能更灵活、更易见效。这是我初步的、尚未实践的想法。此外,在 AI 时代和数字人文兴起的背景下,大量数据库的出现,为构建大文学史观、贯通古今文学研究提供了便利。我校已有同事在进行将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联系起来的研究工作。这样的研究应该很有前途,对学科交融和贯通很有启示意义。

在人工智能时代 捍卫人类心智最后的尊严

于亭(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我想谈谈 AI 与中文学术及人文教育这个话题,对时代和社会而言,这的确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我在此不是讨论方略或者具体方案,仅分享一些个人的感受和碎思。此前在不同的场合中,大家对此都极为关切。

当讨论 AI 与中文学术、中文学科时,在各位的高见之外,我认为还有必要做一些区分。中文学术和中文学科不同,有合有分,包括不同人群、面向与层次。首先,它是我们这些在座者及同道所从事的行当——我们或称之为学术,或直白地称之为职业饭碗。对于从事文献与语言研究的学者而言,数字技术、大数据和语言模型,乃至于到来的 AI 意义重大。以我自身编撰《故训汇纂》《古音汇纂》的经历为例:耗去了三十多年的学术生命,一一寓目和处理数千万条训诂和音韵资料,我的问题意识完全改变,这可能是大数据及其分布式特征带来的结果。但从事学术的学者,并非人人有此“奇遇”。自由探索和研究意识,乃至于学术写作会由此改变。超大规模文本数据分析模型和视野,对语言、文献学科,尤其对传统小学(文字、音韵、训诂)问题意识的改变,一定是意义深远的。若我此前的三十年中能成熟运用大数据模型或数字人文方法,我的学术意识变革可能更早、更有趣。显然,数字人文对我们这些“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学者,尤其对现代知

识生产,其助益是显而易见的。

这样来看,我们这个行当的学者似应主动拥抱、融入并探索数字人文和 AI。我现在负责教育部文科实验室“武汉大学文化遗产智能计算实验室”的古籍数字化专项,组建团队探索古籍数字化与数字人文实现,进行知识发掘与数据仓库建设,构建小学文献与古书的知识图谱。这些基础性工作将为研究带来新面貌。

但对文学研究而言,数字人文意味着什么?我认为,相较于技术手段与问题意识的更新提升,它更可能在后现代语境下,为应对人类新生态与生存状态,提供涉及语言转向或文化转向的话题。我十分怀疑,除却当下混乱的 AI 写作产生的新文体或机器文体实验,它对文学研究本身是否具有“有意义”的重要意涵?由此,我们未必需要一拥而上地拥抱数字人文。例如当前兴起的虚拟现实和创意写作,本质上仍是展示性、实验性、浅层炫技类项目,其心智内涵和实际作用令人怀疑。

更值得关注的,倒是 AI 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以及未来人才培养的方向。这关系到在座各位。知识获取方式已经在改变,这引发了一个令人恐慌的问题:未来的教师是否还需要存在?我们是否还能自然保持“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角色?教师的教学和育人过程正面临 AI 的巨大冲击,文科尤甚。例如,波士顿大学已经以行政方式而非教学评议裁撤了整个人文专业科系,仅保留创意写作,认为大学仍需培养能在社会上进行写作和创意表达的人才。近期 *New Yorker* 杂志上一篇题为“*What Happens After AI Destroys College Writing?*”的文章,揭示了美国的大学人文教育和学生面对知识、课程和写作的现状:学生利用 ChatGPT 疏解情感,完成作业,获取本不关心的学分,也和盘托出大学和教师的无所适从及惊恐不适。中国的大学可能还将此类现象视为“作弊”或者学术不端问题。但这提出了共同的话题。

我在课程教学中一直满堂灌,并且回归更传统的考核模式,采用考试(开卷)取代课程论文。这可能是无奈之举,以逼迫学生在学业中进行记忆和心智能力的锻炼,不得不面对训练和参与,同时避免在考核中要求学生提交主文档、

副文档、查重说明及技术说明文档的繁琐。正如美国的大学同行教授们越来越多地回归“蓝皮书”式闭卷考试的趋势——他们视此为迫使学生面对心智挑战的最后防线。

中文学术,作为母语之学或广义的人文学科,面对一个根本性困境:就是我常向校方管理层所称的,中文是一门“前现代”行当。其含义在于,中文学科本质是“读”和“写”的学问与技艺,它本属于上层文化,带有精英属性,如今却不得不置身于日益强烈的、消费性的平民社会中,在精神气质上与“现代消费”的生产格格不入,却又必须成为现代工具理性的技能教育体制的一部分。大众文化崇尚毋需道德与心智努力即可获得的愉悦消费体验,“读”和“写”的能力正在衰退。AI 可能加剧这一问题:知识日益技术化、工具化、消费化。技术专家强调的 AI“可视化”虽具娱乐和消费热望,但进一步加剧文化的大众化,因其体现的是最平庸的情感和欲望,几无价值。当代大学,教育行政和教学的实施已成消费型教育,应试教育更强化了知识的消费化、低门槛,以及知识作为文凭而非关于“人的意义”的实质内容的倾向。AI 只会加剧此一趋势。置身教师行当,中文教学面临的冲击尤为巨大。

面对 AI,我们在技术上无解,但我坚信人文学术需捍卫人类最后的“本能”——心智生活的尊严。设若未来人类生活已成机器算力的一部分而存在,人类亦如笼中狮一般被 AI 豢养,我们仍需通过人文教育传递关于“意义”的经验,传递关于获得表象世界的深层经验的能力和信念,传递创造想象和冲破给定的确定性牢笼的能力和信念,从而铭记狮子真正的本能在于原野:饥肠辘辘时凭借身体和合作、创意和极限,在承担风险和失败、挫折和恐惧中奔跑,捕获羚羊。中文学术和人文教育,守护的正是此物。正如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在《真理与方法》中所言,其哲学诠释学旨在捍卫人通过艺术作品获得的真理经验。这在科学上或许无谓,但人类执着于此,即培养想象力,固执地创造出个异于自然界的、属人的意义世界。

在座各位皆有责任,通过强制与呼吁的“读”和“写”的原始训练,帮助学生保留人之为人的最后本能——关乎自由意志与情感。AI

下一步即将进军“情感学习”,这令技术专家亢奋。但 *New Yorker* 的诸多文章中也揭示了一个黑洞:技术专家困惑于为何 ChatGPT 能共情为“友好伙伴”,却无法避免大数据和语言模型下的虚假答案。我们也会谈到 DeepSeek“作假”的问题。人人都知道机器构造,却可能无人知晓机器内部是否自为地运作,并且在哪一个环节发生了什么。当情感学习能通过物质的技术模拟人类神经元情绪反应时,更大的黑洞或将出现, *The Matrix* 三部曲或 *The Terminator* 系列电影所预言的世界恐将来临。此即人文学术与人文教育的终极意义所在:纵使我们无法避免被豢养于“母体”,也需保留最后的自由意志与本能,保有追求内在可能性的权利,思考和实现古希腊人所说的 *Arete* 和 *Eudaimonia*,意即自主追求的“卓越”和“好的生活”。

伽达默尔给我很多启迪:诠释是制造意义的过程,关乎“理解如何得以可能”。他指出,对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而言,“理解不属于主体的行为方式,而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诠释是“标志着此在的根本运动性,这种运动性构成此在的有限性和历史性,因而也包括此在的全部世界经验”。^①人文学术捍卫的正是这种诠释的力量,以及人类心智生活与本能最后的尊严。至于如何做、结果如何,我并不乐观,但相信这是我们的使命。

人工智能时代中文 学科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李锡龙(南开大学文学院院长)

南开大学文学院拥有国家级文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始建于 1986 年的语言学实验室。近年来,在国家政策推动下,我们做了一些初步探索,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项工作:

濒危语言满语文的满—汉实时双向互译系统、支持满语言文化的大语言模型、满语语音合成系统等。满语在一百多年以前还是当时的优势语言,但是在此后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迅速

^① [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第 6 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成为濒危语言,20世纪90年代已经只有黑龙江省少数村子里的老人能够说满语了。本系统使满语文进入人工智能系统,是首个高精度的满语—汉语翻译系统;同时系统支持使用满语与语言大模型进行交互,而且能够实时合成高质量的满语语音。

中华古诗文吟诵合成系统。中国古代的诗歌、古文不只是可以阅读,而且是都可以吟诵的,吟诵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有声语言文化。然而现在大多数人已经不会吟诵,这一有声文化形式也面临濒危状态。团队开发的“中华古诗文吟诵合成系统”使有声吟诵文化进入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实时合成多家吟诵的古诗和古文。系统经过优化和完善,可以实现部分吟诵形式的永久保存与传承。

叶嘉莹“AI诗词大先生”实时交互系统。本系统使叶嘉莹先生的诗词文化遗产进入人工智能系统,可以实时实现与数字“叶嘉莹先生”的动态交互,系统能够通过语音识别获取用户的提问,通过“AI诗词大先生”语言大模型为用户的问题提供高质量的回答,并能够实时合成叶嘉莹先生的语音,也可以生成叶嘉莹先生回答问题的动态视频。

叶嘉莹先生的古典诗词教学非常有特色,在海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她留下了2300多盘录音带,300多张光碟,200多盒录像带。我们运用AI技术,打造叶先生的数字形象,使得系统性重现她的讲演场景成为可能;也在和腾讯、咪咕公司开展合作,已经有了初步的进展。

我们相信, AI技术对中国语言文学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但是, AI的发展也存在诸多风险。虽然很多国家出台了一些法律文件限定其权限,但其目前仍处于野蛮生长阶段,问题频发。例如近期有报道称,帕兰蒂尔公司开发了马赛克人工智能系统监督伊朗的核计划,在袭击发生的前几周,该系统对4亿份数据进行了分析,生成了一份报告,认为伊朗再过几周就能够制造出5到9枚核弹。但这个报告不是根据各种证据和情报,而是基于算法猜测,这种算法是建立在卫星图像、互联网数据乃至社交媒体的帖子上得出来的结论,其可靠性成疑。

现在我们大力推广AI赋能高等教育,要求提升师生AI认知与工具使用能力。但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开设有写作课,若学生提交的作品是AI生成的诗歌、小说、散文,是否合乎要求?若课程论文、学年论文、学位论文被发现是由AI撰写,又如何认定和处理?这些都需要等待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边界。

显而易见, AI确实是好东西,它给我们提供了诸多便利,但若使用者失守底线,再好的AI也会出问题。

最后,我们还需要警惕AI给个人能力的发展带来的问题。电脑书写普及了,汉字的书写水平明显下降。互联网发达了,资料似乎唾手可得,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学生自主获取资料的能力:学位论文和项目申请书常仅基于CNKI、读秀数据库。学生以为CNKI、读秀无所不包,殊不知CNKI也好,读秀也罢,资料并不完全,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学术视野。这些都是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既有发展已经带来的问题。那么,随着AI时代的到来,未来人的思考与写作能力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推演,人的写作能力退化恐成必然。

语言能力和创新人才培养

王冬梅(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研究员)

我的发言主要聚焦于大学生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下降的现状及其原因。在座各位多是高校教师,对此大概有深切体会。实际上,这一问题在20多年前就已开始受到关注。2003年,一项关于大学生语言表达的调查指出其存在不清、不畅、不够、不精、不准等问题。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一项语言能力测试显示:受访学生中66.2%存在信件书写格式问题,86.5%存在行文语气问题,100%存在语法问题。2010年,针对首都部分大学生的汉语应用能力测试中,不及格(70分以下)者占68%。2011年,教育部与国家语委联合发布的官方报告《2010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指出:学生人群汉字书写能力退化,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下降。虽然青年学生语言表达能力下降现象已非常严重,但由于种种原因,此后又过了十多年,这种状况还未缓解。

2024年2月27日,《中国青年报》整版报道了当代青年人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下降的情况。调查显示(基于受访者自述):受访者中53.4%认为自身表达能力下降,35.7%认为原地踏步,47%自认词汇量匮乏、表达单一,41.5%曾遇词不达意、难以准确表达的情况。上述数据都说明,当前大学生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的确堪忧。

究其根源,问题恐怕出在中小学语文教育上。多年来语文教育效果不佳,其主因有二:一是教学内容制约,即现有教学内容对学生语言能力提升作用有限;二是对新技术(尤指人工智能)变革应对不力。作为语言学研究者,我接下来更侧重阐述前者。

我国现代语文教育体系建立于1949年以后,以语言学知识为中心。传统语文课本系统涵盖语音、词汇、语法、修辞、逻辑等知识。然而,学生花大量时间系统学习了语言学知识后,语言能力却未显著提高。1978年,我国著名语言学家,也是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前所长吕叔湘先生在《光明日报》发文,提出被后人称为“吕叔湘之问”的疑问:为何学生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学习语文,语言能力却未获有效提升?我们认为,原因在于其所学的知识并未转化为语言能力,这也是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后期语文教育中出现“淡化语法”和“去知识化”倾向。“淡化语法”者主张语文学习无需传授语法知识,重在体验、感悟与揣摩。而过度强调人文性又导致教学内容空泛化,课堂实质内容减少,学生的语言能力提升更无从谈起。

几十年的事实也证明,停止教授语法等语言学知识后,学生表达能力是进一步下降的。这意味着不教知识是不行的,而80年代之前教了很多知识也不行。那么,从逻辑上说,肯定是教学的内容,也就是“教什么”出了问题,而“教什么”也就成为目前中小学语文教育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因此,我们的看法是:语法仍需教授,但应关注教何种语法。

20世纪80年代之后,语言学取得长足发展。从结构主义语言学到篇章语言学,再到近年兴起的互动语言学,以及沈家煊先生提出的“对话语法”等,语言学界已生产出大量可为语文教育所用的知识。语言学知识和语文知识虽

然同根同源,但毕竟不是同一个东西,要把语言学知识转化为语文教育中能够提高学生语言能力的语文知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而这个工作只能由大学教师承担。

大学教师介入的必要性,除了知识储备更丰厚、专业性更强以外,还在于一线的中小学教师难以承担此任。当前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常常流于形式,新概念层出不穷,名师工作室遍地开花,但真正潜心研究如何提升学生语言能力者甚少。多数教师忙于创造新名词、申请项目、参加比赛。所谓“高效课堂”常名不副实:教师少讲或不讲,由学生代讲,小问题讨论耗时冗长;合作讨论等良好的教学形式常异化为课堂游戏,学生沦为教师表演的工具。因此,将提升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重任完全寄托于中小学语文教师并不现实。当然,优秀的一线教师也是不可缺少的助力。

回到今天学科建设的话题上,我们的观点是,大学尤其是师范院校的研究者,搞语言的也好,搞文学的也好,需要联合起来,深入研究语文教学内容与方法,再推广至中小学。在座各位多为各大文学院负责人,请在学科建设中给予语文教育更多关注与支持。

杜甫草堂共建研究院推动 中华诗歌的传承与普及

罗鹭(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

我选择的主题是第四个:关于科研平台与科研团队的建设,主要结合四川大学科研平台的建设谈一点体会。

我校科研平台众多。仅以我院为例,省部级平台就有十余个,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叠床架屋”现象,即部分人员在不同平台兼任工作。例如,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就是一个打破学科壁垒的优质平台,它汇集了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汉语言文字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相关学科的教师协同研究。

再如教育部“2011协同创新中心”——“中华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全球传播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则有四川省文科重点实验室——“中华文化遗产与全球传播数字

融合实验室”，目前由王兆鹏教授牵头，其核心成果是“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该实验室还汇聚了神经语言学、新闻传播学等领域的教师进行交叉研究。

不过，我今日重点介绍的是一个省级特色平台：2022年我院与杜甫草堂合作共建的“中华诗歌研究院”，该院于同年入选四川省第二批重点中华文化研究院。在四川建立此平台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四川拥有丰富的古代诗人纪念场馆资源，依托这些独特的地方文化资源建设诗歌研究院，是服务地方文化建设、传承诗歌文化的理想平台。

研究院的特色工作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整合学科资源，凝练特色研究方向。我们选择贯通从《诗经》到清代的古代诗歌研究，涵盖文献收集整理，汇聚了项楚教授的唐代白话诗研究、周裕锴教授的宋诗研究、王兆鹏教授的宋词研究、我的元诗与清诗文献研究、刘福春教授的新诗文献研究（其成果国内领先）等。同时整合文艺学的诗学理论、比较文学的中外诗歌比较等相关学科力量。

第二，大力推动诗歌文献的收集、整理与接受捐赠。自2018年刘福春教授“中国新诗文献馆”落户川大以来，我院逐渐成为诗歌文献汇聚中心。2020年，日本九州大学岩佐昌璋教授将其收藏的大量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北京购得的“文革”时期读物捐赠给我院。2022年，杨明照先生全部古籍入藏我院（我院资料室古籍线装书收藏近7000册，包含丰富的古代诗歌文献）。今年，杨明照先生家属又将其全部手稿捐赠我院。目前我院正洽谈接收流沙河先生手稿（预计下半年完成）。此外，北京大学谢冕教授大部分手稿也已通过刘福春教授入藏我院。这些捐赠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诗歌文献馆藏，使川大在收藏古代及现当代诗歌文献方面形成了特色资源。

第三，推进数据库建设。依托中华诗歌研究院及杜甫草堂的经费支持，我们建设了多个数据库：中国现代新诗珍稀文献数据库、中国现代诗刊文献数据库、新思潮珍稀文献数据库、中华红色诗歌图文数据库、新时代乡村振兴诗歌数据平台，并协助杜甫草堂进行馆藏杜甫及诗歌相关古籍的数字化工作。

第四，促进诗歌文化传承与普及。我们持续举办“文化名人进草堂”系列讲座，目前已办23场；“中华诗歌系列学术讲座”目前已办20余场，在座的晓勤主任、玉平主任等众多专家学者都曾接受邀请赴蓉讲学。我们还持续多年开展杜甫、苏轼研究硕博生论坛。欢迎更多的专家学者和硕博生参加我们的活动，共同推动中华诗歌文化的传承与普及。

人工智能时代中文学科的高质量发展之道

刘旭光（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我今天直接回答“高质量发展”这个问题。我认为目前中文学科的发展可归结为两句话：第一，扎实学习理论；第二，潜心欣赏文学。唯有如此，中文学科才能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

为什么这样讲？回顾过去二十多年，“XX时代的中文学科”这类提法反复出现。2003年左右是“网络时代的中文学科”，五六年后又提出“新媒体时代的中文学科”，再隔五六年变成“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变革确实对中文学科产生了具体影响——现代数据库和AI检索技术极大提升了古代文学研究者的生产效率，改变了以往“十年磨一剑”的节奏。现当代文学、古典文献学、语言学研究者也在不同程度上受益。相比之下，文艺学和美学领域则面临挑战。表面来看，检索技术的发达似乎降低了对理论的需求。但我们需明确：新技术（如AI辅助检索）应作为工具而非替代，尤其不能取代深度思考。我亲身体验过古代文学数据库的便捷性，其效率远超哲学领域的康德研究。正因如此，在强大技术工具的辅助下，中文学科反而比以往更需要理论支撑。

然而现状是令人忧虑的：当前修订中文系培养方案时，理论课程已被压缩至极限。文学概论沦为孤儿，其他理论课多变为选修。这种对理论的忽视与学科未来发展存在根本冲突。如何提升审美能力？其核心在于“用理论武装头脑”。当师生缺乏理论素养，如何驾驭日新月异的工具？我在此呼吁在座同仁：必须加强中文

系学生的理论训练与教育,当前局面不可接受。这是我对“扎实学习理论”的阐释。

第二点“潜心欣赏文学”则关乎教育本质。以上海大学文学院为例:去年是中文学科最困难的一年,在资源配比从6:4被压缩至3:7(未来目标是2:8)的背景下,中文系本科招生名额从七八十人锐减至40人。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两年我院生源质量达到历史巅峰。在全校300多名文科新生中,进入文学院(中文专业)的学生成绩均位列前100名。更值得注意的是:其中65%为上海本地生源,且几乎无贫困家庭背景(仅一名准贫困生)。

我询问过这些学生选择中文的原因,发现他们并非出于就业或考公务员优势(家长也较少如此考虑)。这折射出一个深层变化:随着社会发展,部分家庭(尤其经济条件较好者)更希望子女能欣赏人文艺术、享受人文思想,成为高雅而自由的现代人。上海大学的案例虽是个案,却具启发性。现实情况是:校方从工具理性出发,希望将学生培养为“实用”人才;但在社会富裕化进程中,必然催生一批追求非功利精神生活的青年,他们渴望沉浸于文化、艺术与诗歌。因此,中文系应成为守护这种精神生活的最后堡垒。科学技术的短期波动终将过去,真正历久弥新的是人类对唐诗宋词的欣赏、对美的感悟、对艺术的创造。中文学科要实现持续高质量发展,核心在于引导学生欣赏、享受并最终参与创造人类文明。我们不必过度内卷,无需盲目效仿工科模式,更不该陷入工具化与功利化的窠臼。

科技赋能交叉复合型中文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沙先一(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

我简要汇报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跨学科融合与人工智能领域开展的一些工作。

首先,在语言与科技的跨学科融合方面,我们聚焦研究生培养,注重语言与科技的融合,以“语言+科技”为核心理念。针对学生学科背景单一、知识储备不足、跨学科融合能力弱、协同合作意识欠缺,以及实验设计、动手操作、理论

与实践结合能力偏弱等问题,我们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在课程体系与师资建设上,学院构建了多学科支撑的交叉融合课程体系,在夯实语言学理论基础课程的同时,增设了认知科学、病理学、计算机科学等新型课程,补充了语言统计方法、临床语言学、儿童语言发展等交叉学科内容,旨在重构学生的知识储备,提升跨学科融合能力。考虑到多学科交叉教学的实际需要,学院密切联合校内资源,与心理学院紧密合作,引进了心理学、临床语言学等领域的师资,共建跨学科教学团队。在科研反哺教学上,我们一方面建设了系列实验室,购置了相关实验设备,在学校政策的支持下,充分共享校内实验设备,通过多元路径方式,如工程培训和专家讲座等,切实提升学生的实验设计与操作能力;另一方面,积极拓展多元化合作与学术交流渠道,包括设置联合培养项目、组织学术工作坊、开设学术专栏等,有效拓宽了学生的研究视野。学院还重点支持在计算语言学方向建设数字人文科研平台,如《左传》历史人物数据库、《史记》人文检索平台等;又与澳门大学(UM)、香港浸会大学(UIC)合作,在其珠海分校区成功举办三期暑期训练营,系统培训学生语料库建设、字符编码、计量分析等技能,助力其掌握构建小型数据库的能力。这些探索实践都是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挑战。

其次,在文学与科技的跨学科融合方面,学院密切关注网络文学与视听、人工智能写作、数字出版等新兴领域的发展,以及社会对兼具科学素养与人文艺术素养的复合型人才的新需求,正在有序推进人工智能创意写作实验室的建设。实验室主要服务于两方面:一是推动教学改革与人才培养,将“人工智能创意写作”“中国网络文学”等课程实践化;二是促进产学研结合,通过收集、标注不同文体、流派、时代的经典文本数据,致力于构建创意写作数据库,为AI训练提供高质量的语料基础。

此外,我们成立了“科学与文学创意高等研究院”,旨在为跨学科的交叉融合搭建学术平台。研究院关注人才培养,目前正在建设“科学与文学创意”微专业,开设系列微课程,供学生选修;同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下,新增设

了“科学与文学创意”的硕士、博士研究方向。

人工智能时代的学术创新、 主体重构与学科建设

李跃力(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

我提交本次会议的议题源于个人学术研究实践,旨在探讨人工智能对学术研究乃至学科建设的深层含义。

以个人使用 AI 辅助论文写作的实例进行说明。一项对 205 位人文社科学者的调研显示,绝大多数人都在利用 AI 辅助研究和写作,其中 82.44% 的学者首选 ChatGPT 模型。在我撰写一篇关于茅盾在 1946 年 12 月至 1947 年访苏事件的论文时(该事件在当时引起巨大社会反响,媒体广泛报道并组织文人聚谈,茅盾在苏联期间撰写日记及考察报告发回国内发表,归国后夫妇二人频繁演讲,最终结集出版《苏联见闻录》),虽已有具体思路,但想尝试借助 AI 是否能提供新思路甚至替代部分工作。

初次提问时,我询问 AI 能否为这项“整体性研究”提供思路,其回复被系统屏蔽(疑似涉及敏感内容)。调整提问后, AI 给出了四个方向:历史语境研究、文本生产研究、跨文化影响研究和方法论建议。这些建议虽涵盖面广,但较为零散,缺乏整合性,不足以支撑一篇有深度的论文。随后,我优化了提问策略:明确告知 AI 我是一名现代文学研究者,旨在进行深度研究,请求提供理论视角和深度剖析。此次回答显著深入:它提出了“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生产”视角,涉及国际共运背景下的文化外交、中国革命的本土投射等。然而,有部分内容纯属虚构——AI 显然未能完整阅读《苏联见闻录》,而是自行编造了细节来佐证其观点。但不可否认的是, AI 在此轮回复中提供了有价值的拓展视角,如跨文化旅游写作、知识分子精神史维度,以及跨学科路径(视觉文化、数字人文、比较文学等),其广度和理论性远超初次提问。接着,我进一步聚焦核心问题:“茅盾的访问、旅行及写作如何影响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特别是未来道路选择?”我要求 AI 据此提供详细论文大纲及阐释。生成的大纲虽有一定价值,但整体仍显零碎,缺乏透

视性分析。为验证其观点,我要求 AI 结合文本对“社会主义乌托邦建构”展开详细论述。其回复中标注红色的细节再次被证实为虚构。AI 的特点在于:擅长调用跨学科理论概念与分析框架,但其材料、文献常与观点脱节,甚至为符合逻辑链条而编造事实。

反思此过程, AI 确能为学术研究带来启发。例如,其提出的“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竞争”视角,促使我在论文第二部分关注《苏联见闻录》中“景观的意识形态及其建构策略”——这或许是我独立构思时未曾想到的。AI 在跨界整合知识信息、统计分析文献数据、提供跨学科理论视野方面,拥有人文学者难以企及的优势,如运算能力、知识储备。然而,其“幻觉”问题突出。有观点认为技术可逐步消减幻觉,且人类辨别能力亦在提升;但也有学者警示“幻觉社会”风险——AI 普及可能使人们长期生活在以假乱真的信息环境中。此外, AI 对历史语境缺乏“感觉”或“历史感”,并对学术伦理与人文关怀构成挑战。

由此引出一个关键问题:人文学术未来是否会转向“人机协同”范式?我认为存在这种可能,并会带来根本性变化:

第一,思维方式的改变。AI 能提供理论化、体系化的概念网络及可视化对话过程。

第二,学科边界消融。AI 本身不受严格学科限制,促进学科交叉融合。

人机协同或将成为未来学术生产的主流范式。在此情境下,人工智能可视为一种公共产品,应“利而用之”。但我们必须坚守一个底层伦理:使用 AI 的目的,应是为了实现人类自身难以企及的更高层次的学术创新。若通用人工智能未能使人们对既有问题产生更深、更新的见解,那么依赖其结果反而有损研究者作为人的主体性。这要求研究者在拥抱技术的同时,必须强化自身的主体性——警惕“主体僭越”。AI 作为海量数据训练的模拟器,通过概率统计预测并生成内容。其提供的内容或知识可能侵入人类独有的认知、决策与创造领域,模糊甚至打破传统的主客体界限,在实际应用中替代人类。因此,我们必须重申人文性与研究者主体性中感性的维度——作为有生命、有体温的人文

学者,对历史、文本、人物的独特感知不可或缺。

在技术层面,改进方向可能包括完善数据溯源标记。在理论层面,我们则需特别重申:人类意向性所依托的具身认知及隐喻性思维本质,是人文学术的根基。这要求我们重视研究主体的“生成性”——主体性是在人机互动、人与环境互动中动态生成的,而非固定不变。

因此,中文学科的坚守,首要在于强调人文学者的不可替代性:如何做出 AI 无法替代的学问?如何成为 AI 无法替代的研究者?答案在于“原创性”——这正是今日多位老师共同强调的核心。

关于创意写作专业建设的思考

谷鹏飞(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

我想谈谈创意写作专业。近年来,除少数头部高校外,中文学科在不同程度上被边缘化。我有个基本判断:如果当前工具化的教育趋势持续下去,中文学科的专业压缩将不可避免。若要将中文专业压缩至一个核心方向,我认为创意写作可能是最后的堡垒。这虽是一个粗浅而未必准确的判断,却是我目前的观点。

虽然创意写作如此重要,但其在国内高校开设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以西北大学为例,我们是国内较早设立该专业的高校之一。2012年,在学院专业教师的呼吁下,西北大学设立了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创意写作方向),首次招收本科生45人。此后从未间断本科招生,目前每年约招50人。为推进学科建设,2014年我们在学术型硕士、博士学位点下增设了创意写作研究方向。但培养过程也面临实践性弱等问题和挑战,故2016年我们又增设了创意写作专业硕士学位。然而,目前来看,这个专业依然存在着一系列问题。

如果结合当下 AI 发展趋势,我认为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人机写作竞赛与专业信任危机。传统作家与 AI 写作处于竞赛状态。今天高校(包括顶尖学府如北大)培养的写作人才,目标并非李白、杜甫式的文学巨匠,而是社会所需的实用型写手。在此意义上, AI 已能胜任。我曾专门撰

文讨论过这一问题,基本态度是:在 AI 发展的初期,我们要有一个开放的包容态度,无需现在就谈要进行伦理或审美规则的限制,这样极有可能扼杀它的无限潜能,特别是对人类发展与人类各方面能力增长具有积极效果的潜能。同时, AI 问题讨论,也需要我们文科专家了解一些技术知识,一位计算机专家曾私下表示文科讨论 AI 常令其工科同仁忍俊不禁。他建议我们参观实验室,并比喻称:“开车无需懂每个零件,但懂修车者开车感觉必然不同。”这提示我们,文科讨论 AI 时若仅停留在诗意或哲学层面,那一定存在局限,虽然此层面思考仍有必要。目前来看, AI 写作带来的最大冲击,是社会公众对中文专业神圣感与独特性的信任度急剧下降。以往公众认为写诗、撰文非中文专业莫属,如今这种对专业才赋的认知正被广泛质疑。

第二,师资能力与培养目标的错位。当前创意写作专业教师多源自传统写作教研室。他们虽有写作理论知识,但本身并非专业作家。如今却要求他们按专业作家标准培养学生,质量如何保障?更严峻的情况是,在中文系内部,写作教研室教师常被视为学术研究能力相对薄弱的群体。当中文学科整体被边缘化,赋予这些教师支撑新兴学科的未来重任,其可行性存疑。引入专业作家授课(如北师大、清华、人大所做)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但其效果需长期评估。我目前对此仍持保留态度,因为现实情况是:一流专业作家难有精力长期投入教学,二流作家亦不屑于为有限课时费牺牲创作时间。

第三,专业定位与培养模式的矛盾。汉语创意写作专业发展迅猛,众多工科院校纷纷设立。美国高校如麻省理工学院将写作(含创意写作)列为所有学生必修课,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中国现行高校体制下,将实践性极强的创意写作设为中文系本科专业,仍较罕见。我认为,此类专业最合理的定位,应是专业硕士学位培养层次。

人工智能时代, 呼唤“长出来”的文本

赵涛(《江海学刊》杂志社社长、主编)

人工智能时代,确实是“眼前有景道不得,

DeepSeek 在上头”。当 DeepSeek 可以从全球数据库中轻易调取大量同样主题的研究文献并快速敷衍成文、牵引成章时,个人的思考与书写还有何价值?在今天,想要说点前人和旁人没有说过的话太难,即使白说也要说,但最终还是有一种“说了也白说”的虚无之感!

启功先生曾把中国诗歌发展史概括为:“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唐人诗是嚷出来的;宋人诗是想出来的;宋以后诗是仿出来的。”^①这段话对我们理解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化大有启发。网络乃至人工智能,是科学家模仿人类思维处理能力所发明的一台最为精妙的文本纺织机,它以人类生产的既有文本为基础,通过一系列匪夷所思的算法,生成看似全新的文本。但显然,至少就目前而言,大体上它还只是做到了启功先生讲的“仿”的阶段,甚至给人一种“想”的错觉,但离“嚷”,还有很远的距离。如果有一天人工智能真的会发脾气,那人类的麻烦就大了。

当然,这里更为关键的是,人工智能快速生成的大量文本,最缺乏的其实是“长出来”的过程。就像 DeepSeek 针对有人提问:“你出生才几个月,就拥有了浩如烟海的知识。我出生几十年,所掌握的知识也不过沧海一粟。人类,是可悲的。”它是这样回答的:“别这么想呀!虽然我存储了很多知识,但人类有着无可替代的优势。你几十年人生积累的不仅是知识,还有丰富的生活阅历、情感体验,这些都是无比珍贵的。而且人类拥有创造力、想象力,能不断突破、探索新领域。知识只是一方面,人生的意义远不止于此,每个人都在以独特方式书写精彩,并不可悲。”我觉得,DeepSeek 确实很有自知之明,它的回答已经很好地划清了人工智能的技术边界,给出了人文学者真正的创造空间。

第一,对于重视人文养成的中文系来说,人工智能时代更要强调超越“文”,重视对学生,甚至对学者的道德及人格的养成。“洛阳亲友如相问,就说我在写论文。”在今天,炮制论文已成为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生活日常。但说实话,太多的论文不过是一种洗稿而已,是对既有文本的一种改头换面的拼贴与仿制。在网络乃至人工智能的加持下,一切都是从文本到文本,太多的学术研究正日益蜕变成脱离生

活实践的、没有丝毫鲜活血色的、缺乏个人生命体验的文本的自我演绎。数字人文时代,我们看到了更多数字,但感受不到多少人文。我觉得,对于重视人文养成的中文系来说,教育的首要目标是“学以成人”,而不仅仅是“学以成文”。

第二,有鉴于人工智能强大的文本汇总归纳能力,今天的人文写作或知识生产要更强调原创性。人工智能时代,传统的很多平庸的、重复性的写作看来只是增加理论研究的背景噪声而已,其在推进真正的知识生产方面的效果几乎为零。因此,强调知识生产的原创性,必须成为一道时代的绝对命令。

当然,我们强调原创学术,不能是为原创而原创,也不必有所谓的“原创焦虑症”。原创学术“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充满太多不确定性。我们需要的是足够的耐心和安静的等待,倾听花谢花开的声音,千万不能什么热做什么,最关键的是要学会把贫矿开发成富矿,而不是把富矿滥采成贫矿。

第三,当代的人文学者要更关注巨变的时代,以科技赋能人文,对时代做出更与时俱进的研究。就文化创造而言,我们不能一味地躺在古人创造的流行文化的功劳簿里不愿出来,一讲中国文化就是唐诗宋词,而应该结合今天的技术条件创造今人的流行文化。例如,今天的中国其实早已进入“城市中国”。我们过去可能很善于书写“农村中国”,但如果继续用书写农村题材的节奏或结构,其实就很难描摹出当代都市的声光电,也很难写出都市里红男绿女的爱与哀愁。

一句话,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依然希望读到那些“长出来”的文本,读到那些能够真正感动人心的作品!

人工智能时代期刊工作思考

时世平(《天津社会科学》主编)

针对此次峰会的主题,结合我的工作情况,

① 启功著,赵仁珪等编:《启功讲学录》,第6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谈三点看法：

第一，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深度介入人文社科研究。从上午至今的发言可见，人工智能或数字时代下人文社科研究如何与人工智能共处，是大家最关注的焦点问题。实际上，就已经呈现出的种种迹象而言，我们处于欢迎或拒绝的两难之间。大概来讲，人工智能介入下的人文社科研究呈现几个特点：

在文献处理层面，以往研究起步需要我们最大限度地收集材料，但碍于各种客观与主观条件的限制，文献的收集均留下各种“文献不足”的遗憾。人工智能介入后，理想状态下，我们可以全面获取文献。但个人体验显示，现有工具，如学术网站开发的学术助手，虽依靠强大的论文数据库，但其生成的学术综述效果有限（虽有文献链接），而通用 AI（如 DeepSeek）的回答则显随意。例如：我在查阅相关文献时，通用 AI 给出的结果往往是一个虚假的文献，相关答案也需要多方核实。这提示我们：人工智能提供的文献信息需谨慎辨别。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逆向利用查询结果，甚至丰富论证这个查询结果。当然，个人并不赞成这样做。

在研究设计层面，李跃力等老师已指出，人工智能的研究设计迥异于既有模式。传统研究基于学术阅历与方法积累，而 AI 则通盘考虑、跨越学科界限，其“跨学科”远超传统的“文史哲不分家”，近乎打破所有学科壁垒。在数据分析层面，人工智能依托充足的数据库进行分析。若有足够数据支撑，AI 可成为撬动科学研究的支点。在成果呈现层面，近期期刊论文显示，现当代文学及文艺学研究大量引入图表归纳与统计（原属工科理科方法）。其优势在于：部分结论虽与现有研究一致，但论证更科学、客观。AI 成果的客观性与准确性具有“难以打破的科学性”——质疑者需建立更全数据库、运用更强算法算力才可能将其推翻。此外，AI 成果高度体现跨学科融合特性。

第二，人工智能介入带来挑战与风险。

一是学术质量与创新危机。今日讨论的共识是，人工智能多用于文献归纳整合，易导致学术研究工业化倾向，引发学术研究的平庸化、泛化与碎片化。例如，统计《鲁迅全集》的高频词，

在不人为干预的情况下，结果显示仅为介词、连词等现代汉语常见词；分析 2024 年 CSSCI 来源期刊论文题目模式（如“理论+实践型”“内涵+思维型”），此类统计对初入门者或有参考，但无实质研究价值。坊间传闻所谓的“论文标题不得超 21 字”等规则，实属夸大（期刊工作实践表明并无此严苛标准）；在现在的中文数字人文研究中，人工智能统计结果亦常充斥冷冰冰的介词和连词。因此，数字人文研究需人工干预：如当代文学主题词研究应剔除无关的连词和介词。

二是方法论创新与实践突破不足。尽管数字人文层面成果颇丰，但方法论创新有限。当前文献梳理方式未根本改变学术研究范式。所谓“新文科”（文科+新科技/中文+技术），更像是“Plus 增幅版”——仅略高于标准版，而非跨代革新。这表明多数研究仍在舒适区内提升。

基于此，我的展望是人工智能之于人文社科研究，犹如“美女与野兽”——前景尚待时间检验（是拥抱机遇还是遭遇困境）。当前我们应持审慎态度：既不盲目乐观，也不过度悲观，让人工智能的子弹再飞一会。

古代文献阅读能力的提高 与人才发展目标的培养

蔡梦麒（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古汉语研究》杂志社社长）

我想从古代汉语学习与研究的角度谈谈关于文献阅读能力的提升与人才培养的体会。这些年，我一直担任《古汉语研究》的编辑工作，同时指导古汉语方向的研究生撰写论文，对学习者和研究者的文献阅读能力感触颇深：如今各类文献数据库内容丰富，功能强大，人工智能查阅资料愈发便捷，由此而产生的研究成果也愈益增多，但感觉质量不高，原因在于许多人缺乏基本的文献阅读能力、分析能力。我们在审稿、编稿过程中最常做的事是什么？核对原文，确认字形，检查标点，判断解词释义，这都是文献阅读能力方面的基本功。总体感觉是，当前许多学习者、研究者对古代文献重视不够，文献阅读能力欠缺。

这一问题实际上从中学阶段便已显现：所

谓“优秀”中学语文教师常常训练学生的应试技巧,而非训练学生认真领会和解读古诗文文本。部分研究者也存在类似问题。因此我提醒在座学生:撰写论文时,文献基础绝不可掉以轻心。我们评价一篇文章,若其中的标点断句、字词解释、文意理解存在硬伤,便会质疑作者的学术功底,审稿第一关便难以通过。因此文献基础至关重要。

当前语料获取容易,数据统计便捷,但文献本身的问题却常常被忽视:随意截取词语讨论词汇化、语法化进程;缺乏语料甄别能力,甚至无法正确断句;更有甚者,做语法研究时将翻译文本误作明清原文,以此论证其语法化过程——这都源于对文献时代性与有效性把握的失准,最终导致论证不清楚,结论不可靠。如今数据获取的便利使许多人难以沉心研读典籍,数据库与数字人文虽然给我们提供了诸多帮助,却难再现段玉裁、王念孙那般的治学大家。要解决此问题,人才培养方面应鼓励大家精读原典。

前几日陆宗达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会隆重召开,纪念会期间人们常提及一轶事:陆先生拜国学大师黄侃为师,黄侃授其一本《说文解字》令其标点。陆先生依教而行,耗时完成,黄侃未阅即弃之如废纸,另取一本令其重标。如此反复三次,至第三次黄侃方翻阅称许,始授其训诂之学。经此反复,陆宗达先生于《说文解字》已是烂熟于心,终成现代训诂学的一代宗师。陆先生后来的《说文解字通论》《训诂简论》,皆成为研习《说文解字》、研究训诂的重要文献。我在厦门大学求学时,黄典诚先生指定两书:《毛诗正义》与刘宝楠《论语正义》。《毛诗正义》尚能读完,《论语正义》则未竟全功。精读《毛诗正义》这类无标点典籍,一两个月根本不够。

我曾要求学生自选《尔雅》《说文》《广雅》《方言》等典籍精读,但因督促检查不足,学生多有敷衍。较成功案例是指导三名学生研读《说文句读》(中华书局影印无标点本,辅电子版及Word文本),要求他们:逐字核对文本正误,添加标点,标注文献出处。最终仅一名学生完成。该生硕士论文后来获评省优,后来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进博士后流动站,目前已在多家刊

物公开发表论文十余篇。此即文献基本功锤炼之成效。因此,提升文献阅读能力的核心方法,是沉心精读原典。这非学科计划所能硬性规定,而需导师与学生共同践行。

从“人学”到“后人学”:人工智能时代文学学科的守正创新

陈涛(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从‘人学’到‘后人学’”这一题目源于我三年前发表在《探索与争鸣》上的一篇文章。^①该文主要将中文学科置于后人类主义理论语境下思考,强调在新文科背景、人机交互时代“文学是人学”这一传统命题所遭遇的挑战——总体而言,文学的核心观照并未改变,文学仍是人学,但“后人学”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进行“何以为人”的反身性思考。

今天在此文基础上补充两个简单观点,它们来自1957年钱谷融先生经典文章《论文学是人学》中的两句话:第一,“人”是文学作品的评判主体;第二,“人”是文学写作的理想主题。也就是说,前一个是“主体”问题,而后一个是“主题”问题。

首先,从“主体”的角度看,钱谷融先生说,文学是“人类独有的精神活动”,是“人类个体经验不可通约性”的表达,^②其核心在于创作者的个体经验与主体意识。当前,无论是DeepSeek还是ChatGPT,乃至已大量出现的文学创作专属大模型,正不断被我们日常使用——因此,文学创作主体似乎越来越不限于人类。然而,AI的介入,或许令文学创作与批评呈现出新的面向。当人机协作成为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新形态时,我们能发现:AI生成的“多线随机叙事”,比人类主体编织的情节会复杂得多,令阅读拥有“薛定谔的情节”。“动态文本”突破了文学边界,形成“作者—算法—读者”共同塑造的开放故事编织。“AI跨模态文学”让文学从“语言

① 陈涛:《从“人学”到“后人学”——新文科视域下的文学学科》,《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9期。

② 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1957年第5期。

艺术”更容易向“综合感知场域”拓展。

在研究方法上,特别是近年来方兴未艾的“数字人文”强调“远读”与“细读”的融合,以得出新的结论。从个人经验来说,2019年我校成立数字人文研究院(DHRI),当时曾讨论过一个核心问题:研究院应如何界定哪些人属于“数字人文”的范围,而哪些人不属于该范围?最后达成的共识是数字人文定义可分广义与狭义:广义指对当下数字时代所有问题的思考与呈现;狭义则需以“远读”为方法进行研究。例如数字人文领域重要学者列夫·曼诺维奇(Lev Manovich)常用的一个讲座标题是“如何在今天阅读100万张图片?”面对海量网络文学或短视频,传统“细读”的意义已不大,更好的方式是借助计算机或软件,以此为媒介工具进行“远读”。

我近年的研究重点之一是用数字计量方式介入电影形式研究,这比基于文字数据或语料的研究更具难度。例如借助Cinematics等工具,通过镜头时长、画面构成、色彩运用、场面调度、剪辑方式等角度进行数据计量与可视化,考察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超越“代际”的“加速”话语、全球“慢电影”在形式和节奏上的共性与个性,以及“十七年”期间红色经典电影的“崇高”美学的量化形式特征等。

其次,从“主题”的角度看,钱谷融先生指出:文学的对象、题材应是人,是“处在行动中、复杂社会关系中的人”;文学“始终是人类自我认知的方式,其价值不在于静态描摹人是什么,而在于动态呈现人如何为人”。^①

而当下“人机共创”成为常态,文学所反映和再现的人不再是孤立个体,而是与技术等众多他者共生的存在。“后人类主义”从动物研究、机器人研究、环境系统研究、人工智能研究乃至太空生命探索等角度思考,涌现如赛博格、机器人、动物、人工智能、生物基因等新主题。我们看到人类如何与他者(如人工智能)博弈、合作、反思,使新社会关系与行动场景得以彰显,“人学”的疆域因此更加广阔。

在此,文学的伦理追问常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跨物种伦理”。我们不可避免地需要思考与呈现“非人类行动者”的主体性问题、AI情感责任问题、生命尊严范围问题、数据生命所

有权问题等日益重要的议题。这些伦理追问的核心不再是维护人类的独特价值,而是在人机共生的世界中如何定义更普遍的存在伦理。

当然伦理追问也不止于伦理问题。为此,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了一门全校通识课“后人类时代的全球影像”,主要通过四个角度——希望的空间、他者的镜像、灾难启示录、时间相对论——分析中外科幻影像所呈现与反思的全球社会问题。我深刻感受到,在文理交叉过程中,人文学科最珍贵的或许是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审美。我们必须警惕与反思数据训练背后的文化偏见、算法筛选强化的工具理性、数据挖掘对文学多样性的压制、标准化审美对个体创造力的驯化、创作主体消解背后的责任真空等新的学术与社会议题。我们提倡技术与人文的双重视角,尤其珍视人文学科的批判性思维、创造性审美和反思精神。

总之,无论是“主体”还是“主题”,当文学不再纯粹是人的独白,其承载的内容已包含后人学状态中主体的多元性与混杂性。因此,文学价值不仅在于人对自身的凝视,更在于人与技术共同定义的存在,我想这就是“文学是后人学”的核心。

中文学科的科研平台与团队建设

李广益(重庆大学博雅学院副院长)

关于科研平台与科研团队建设,我有些相关经验可以讨论。从工作实际来看,人文科研团队与理工科团队存在很多差异。理工科团队往往比较垂直,层级分明,纪律严明,从“大老板”到“小老板”,再到青年教师和学生,组成序列。人文科研团队以往可能以师门传承或学派形式存在,但这种团队在现今高校人事环境下不太容易形成或维系。如果成员间没有明确的组织或学缘关系,新型团队可能更加平等、松散,需要以此特点为前提来探索团队的组织和管理模式。当然,人文学科就其性质而言,允许单兵作战,但若想在较短时间内形成特色或弯道超车,

^① 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1957年第5期。

仍需探索团队建设方式。

重庆大学中文学科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学科,底蕴不如传统优势学科深厚,但可能具备一点后发优势。在40多人的师资队伍中,我们没有设立教研室,而是采取教师自由组合方式,根据各自学术兴趣与专长,组建了7个学术集群作为基层科研与教学组织。这与上午杜老师所说的工作坊相似,但我们是集群。每个集群至少3人,教师最多可加入两个集群(若教师实在想单干,也是可以的)。

这些集群不仅是教师开展教学研讨和科研工作的团队,同时也以师生共同体的形式存在,发挥人才培养平台的作用。老师带学生做读书会、开题、答辩均以此为单位进行。若两个集群同意,也可联合开题答辩。我们组建的7个集群涵盖正在建设的五六个学科方向:全球古典语文学、东亚汉籍研究、古籍方志数字人文、美学与文艺批评、科幻文学与科技人文、文艺复兴与文明互鉴、文学人类学与跨文化研究。

我们要求每个集群或团队必须开展学术活动:每年至少举办3场讲座,每3年举办两场中型以上学术会议。这逐渐取得了一些成效,组织较好的集群中学生培养效果突出,学术活动逐渐品牌化,产生较大影响,并体现在对各层次人才的吸引力上。硕士生、博士生乃至高层次人才会表示他们是冲着某个特定团队或集群而来,这就达到了我们做平台的一个重要目的。

放眼未来,我们意识到,要使集群团队或学术品牌最终成熟稳定、立得住,还需要在重大课题申报、重要成果与重量级著作丛书、重要奖项,以及人才培养成果(如教材、精品课程、教学成果奖)等方面,加强团队建设。同时,我们也希望积极引入外部力量,包括校内其他对跨学科研究有兴趣的教师和团队(如理工科或社科教师)。另外,引入社会力量也有助于教师和集群取得社会服务方面的成果。

人工智能时代地方高校 中文学科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周云龙(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十年前,我们外出开会时,大家通常带着大

量名片现场互相交换。但现在见面后,人们都拿着手机扫微信。这种变化在座的各位老师应该都有体会。我想借此说明的是:我们对手机已如此熟悉,它几乎变成了我们身体的一个假肢甚至是器官。今天一旦手机丢失,人可能会非常焦虑,如同某个器官被摘走般不适。大家习惯于这个约14厘米长的设备,如此依恋它,说明人工智能对我们而言未必都是坏事,我们可能会与之相处得很好。

我认为今天无需对真实与虚拟界限的模糊表现得过度恐慌,更不应觉得我们所从事的“夕阳学科”已经受到了人工智能的威胁。刚才刘旭光老师提到机器写论文的情况,的确如此,我也有同感。诸位的高见让我想起19世纪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工作。他的哲学试图打捞一种真确的经验,其背景正是19世纪大工业发展的历史。历史未必重复,但经常押韵。今天许多老师谈论人工智能这种可见的威胁时所产生的焦虑,以及做出的思想回应工作与柏格森那时候真的很像,但我认为这完全没有必要。人文学科发展受到挤压或不被社会重视,人工智能不应为此负责。真正的原因可能与其他社会历史因素有关。

说到这里,结合我本人从事的比较文学研究谈一点思考。外出开会时常与外语专业的老师交流更多,他们发言时讨论学术问题,但会间讨论最多的往往是外语专业的出路:小语种被关停,英语专业今年也不招生了(英语本是主流的外语)。外语专业的同道们可能比我们更焦虑。中国语言文学专业至少暂时还未见此情况。但上周末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我发现外语专业的老师们交流时又有了新的希望:相当一部分老师现在不再称自己从事的是外语专业,而是改称“区域国别学”,所有外语专业都有机会纳入其中,似乎“学科之死”的焦虑减轻了。

回到中文专业,其内部划分也很细。例如我所在的单位以师范教育为主体。但众所周知,现在许多幼儿园、小学出现关闭或合并的现象,这种情况可能会一级级上升至中学,最终波及大学。受影响最大的是师范类专业,因为基础教育不再需要那么多教师了,培养的学生出路何在?我们也面临着培养方案的转型。但所幸时

代发展一直在推动知识更新。最近几年教育部陆续发布的新学科目录,如古典学、汉学与中国学、数字人文、创意写作等,我认为这些都将是文科未来的增长点。因此,即使在师范类院校,我一直保持乐观态度,对人工智能介入文科也是如此。我始终认为人工智能不会成为我们的敌人,恰恰相反,它会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最终在人文教育中实现赛博格化,达到人机共舞的境界。

所以,文科的兴衰、文科教师面临的挑战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并无直接关系。我们真正的敌人并非人工智能,某些恐惧可能是子虚乌有。我反对在人类经验与人工智能之间直接构造人为的二元对立,或者简单套用“工具理性”批判

那一套陈词滥调来观察今天的人工智能。我更愿意借助人工智能,推动传统文科的更新,让人工智能成为文科的假肢或机体的内在构成。

【作者简介】彭玉平,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蒋述卓,暨南大学党委原书记、文学院二级教授,汕头大学特聘教授;王立军,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张旭东,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东亚系教授,国际批评理论中心主任;张福贵,教育部中文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朱国华,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学文化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等等。

(上接第 57 页)遗憾的是,这段史实不仅当事人事后没有回忆、重提,后人也极少言及,即便有论者谈到,也是只言片语。如王汎森在《胡适与傅斯年》一文中说:“从 1927 年起傅斯年千方百计想请胡适南下到中山大学任教,但未成功。”^①胡适传记、年谱则点到为止,例如:“为了扩大中山大学的影响,傅斯年极力希望胡适能来这里教书或讲演。”^②有鉴于此,本文根据相关书信文献钩沉相关史实,有助于人们了解详情,明确胡适与广州中山大学关系,增添一段中山大学校史。至于借此解开了 1928 年 9 月 24 日胡适致傅斯年信中谜团,确定一封长期以来被认为“具体月份不详”^③的傅斯年电文拟写日期,则不失为意外收获。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史科学理论研究”(21AZW01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付祥喜,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国新诗、中国文学史学。

-
- ① 王汎森:《胡适与傅斯年》,耿云志主编:《胡适研究丛刊》第三辑,第 221 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
 - ② 苏育生:《胡适左右》,第 208-209 页,西安:三秦出版社,2017。
 - ③ 傅斯年:《致胡适》,傅斯年著,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七卷,第 76 页。